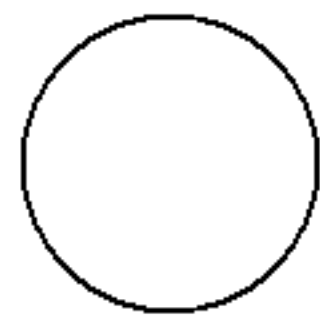


红旗



一九七四年 3



红旗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

一九七四年第三期 目 录

批林批孔 反修防修

短评：**认真学 深入批** (3)

批“克己复礼”

——林彪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纲领.....《人民日报》社论 (6)

孔子和林彪都是政治骗子.....康 立 (8)

秦统一六国起决定作用的是什么？

.....辽宁大学 李 时 (15)

批林批孔是反修防修的伟大斗争燕 枫 (22)

揭穿“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反动实质

.....上海吴泾热电厂 郭企元 (27)
上海重型机器厂 黄土耀

从“天马”的下场看天命论的破产

.....内蒙古阿巴嘎旗 乌云格日勒 (30)

污蔑劳动人民就是反对革命

.....天津铁路分局天津站六号门工人评论组 (33)



我们革命妇女最恨孔孟之道……………大寨大队铁姑娘队 (37)

放手发动群众 掌握政策界限

……………中国共产党上海第五钢铁厂委员会 (40)

联系路线斗争实际批林批孔

……………河北安平县南王庄大队党支部 (45)

反修斗争的强大思想武器

——学习《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辛 风 (48)

锄毒草 化肥料

到底是谁家的“工具”？

——评安东尼奥尼的“申辩”……………华 言 (55)

评晋剧《三上桃峰》

……………初 澜 (60)

抓革命 促生产 促工作 促战备

从农业出发办好地方工业

……………庄 宇 (66)

让工农兵英雄形象牢固地占领故事片阵地

……………江 天 (72)

科 学 史 研 究

人类对地球的认识和改造

……………李之棣 (77)

☆ 三 月 三 日 出 版 ☆



毛主席语录

世界是在进步的，前途是光明的，这个历史的总趋势任何人也改变不了。我们应当把世界进步的情况和光明的前途，常常向人民宣传，使人民建立起胜利的信心。同时，我们还要告诉人民，告诉同志们，道路是曲折的。

社会主义制度终究要代替资本主义制度，这是一个不以人们自己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不管反动派怎样企图阻止历史车轮的前进，革命或迟或早总会发生，并且将必然取得胜利。



毛主席语录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

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修正主义者抹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区别，抹杀无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区别。他们所主张的，在实际上并不是社会主义路线，而是资本主义路线。



批林批孔 反修防修

认真学 深入批

(短评)

批林批孔的群众运动，正在全国蓬蓬勃勃地发展着。广大工农兵以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投入战斗，有力地发挥了主力军的作用，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干部也积极行动起来，形势一片大好。

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批林批孔运动，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广大群众动员起来以后，斗争锋芒直指林彪的反革命罪行及其修正主义路线，直指林彪宣扬的反动没落阶级的意识形态孔孟之道，同时在各条战线上对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思潮给以有力的回击。深入开展这场运动，必将更好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把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

“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始终要抓好的重要问题。林彪推行修正主义路线，把孔孟之道作为他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思想武器，革命人民要战胜它们，批倒它们，也必须掌握自己的理论武器，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马克思主义是在斗争中发展的，我们也只有在斗争中才能真正学到。结合批林批孔，认真看书学习，才能提高我们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在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中不致迷失方向。要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的方法，去揭露林彪修正主义路线和孔孟之道的



反动本质。广大群众深切体会到，林彪所鼓吹的孔孟之道，虽然有一定的欺骗性，但只要运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武器，进行阶级分析，并联系到这些黑话出笼的历史背景，揭露林彪反党集团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的罪行，就能抓住它们的反动本质，使它们原形毕露。因此，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我们必须认真读马、列的书和毛主席的书，反复学习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和有关批林批孔的文件，把学习和批判紧密结合起来。要用学习来带动批判，用批判来促进学习，边学边议边批。这样才能批得准，批得深。我们党的历史证明，每一次反对修正主义路线的斗争，同时也是一次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运动。在斗争中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是每个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重要任务。

批林批孔，必须以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作指导，紧紧抓住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林彪宣扬孔孟之道的内容很多，中心的一点是“克己复礼”，即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他要按照孔老二“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这个极其反动的政治主张办事，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要“一律给予政治上的解放”，让地、富、反、坏、右重新上台，恢复地主买办资产阶级在我国反动统治，使我们的国家变成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他要“兴”的是被中国人民推翻了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他要“继”的是地主资产阶级压迫剥削劳动人民之“世”，他要“举”的是牛鬼蛇神包括王明之类汉奸卖国贼这帮“民”。这是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实质所在。抓住这个反动实质，才能打中要害。许多地方的经验证明，首先集中在这个问题上，反复批，深入批，对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就认识得更清楚了，对无产阶级专政下坚持继续革命、反对复辟的重要性就更明确了，对党的基本路线的体会就更深刻了。对于林彪所宣扬的孔孟之道的其他各个方面，也要围绕“克己复礼”这个中心，一个方面一个方面地、一条一条地进行批判，从政治上、从思想理论上进一步加深对林彪修正主义路线极右实质的认识，使革命大批判深入持久地开展下去。

要把批林批孔的群众运动引向深入，必须联系实际，即联系当前的阶级斗争、两条路线斗争的大是大非问题。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中，两个阶级、两条道



路、两条路线的斗争始终存在，这是客观的事实。林彪反党集团的出现，正是国际国内阶级斗争的尖锐表现。林彪虽然早已叛党叛国、自取灭亡了，但他那条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还没有肃清，他所代表的国内外反动势力，也没有停止过向无产阶级进攻。**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批林批孔都要联系到路线问题。是搞马克思主义还是搞修正主义？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这是最关紧要的问题。特别是在上层建筑领域内，更要警惕和反对修正主义思潮。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是肯定还是否定，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革命的新生事物是支持还是敌视，归根到底是一个路线问题，是坚持还是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问题，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还是复辟倒退的问题。这些都是大是大非，必须通过群众性的批林批孔斗争，加以解决。要牢牢掌握批林批孔这个中心，防止纠缠于某些问题而冲淡批林批孔。在斗争中，要正确区别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众，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批林批孔搞得越好越深入，群众干部的觉悟就越高，就越能搞好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原则基础上的团结。有一些人民内部的问题，可以在批林批孔的战斗过程中求得正确解决。

群众运动起来以后，总结和推广典型经验就成为指导运动的重要方法。典型是体现党的路线和政策的，具有很大的鲜明性。认真抓好典型，做到“**一般和个别相结合**”，这是毛主席一贯倡导的**科学的领导方法**。在批林批孔群众运动中，要做好调查研究工作，注意不断总结**经验**，抓好典型。还要组织一些有较深刻分析的、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批林批孔文章，以促使运动的深入发展。

领导一定要走在运动的前面，不要落在它的后面。各级党委和领导同志要以积极的态度，深入到群众中去，同群众一起战斗，并在斗争中自觉地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只要我们坚决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办事，认真执行毛主席、党中央的各项部署，波澜壮阔的批林批孔运动必将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进一步深入开展起来。



批“克己复礼”

——林彪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纲领

《人民日报》社论

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一个大规模的批林批孔运动，正在全国蓬蓬勃勃地兴起。

当前，许多地方的工农兵群众和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首先集中批判林彪效法孔老二“克己复礼”，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效果较好。

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克己复礼”。他把孔老二复辟奴隶制的这面破旗，视为至宝，称为万事中的大事。在九大以后，从一九六九年十月十九日到一九七〇年元旦，两个多月的时间里，林彪及其死党就写了四条“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克己复礼”的条幅。这充分暴露了林彪反党集团迫不及待地妄图从根本上改变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和政策，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野心。

林彪“复礼”的政治纲领，是坚持设国家主席。他对抗毛主席的多次指示，叫嚣“国家没有一个头，名不正言不顺”，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发动被粉碎了的反革命政变，妄图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名正言顺”地复辟资产阶级专政。

林彪“复礼”的理论纲领，是“天才论”。他把自己吹成“生而知之”的“天才”，以“天马”自居，自比文王，为他篡党夺权制造理论根据。

林彪“复礼”的阶级内容，就是把被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重新扶植起来，建立林家法西斯王朝。他接过孔老二“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的反动口号，狂妄叫嚣要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敌人“一律给予政治上的解放”。

林彪这条“克己复礼”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集中反映了地、富、反、坏、右和帝、修、反在中国搞反革命复辟的愿望。

早在建国前夕，毛主席就告诫全党：“帝国主义者和国内反动派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他们还要作最后的挣扎。在全国平定以后，他们也还会以各种方式从事破坏和捣乱，他们将每日每时企图在中国复辟。这是必然的，毫无疑义的，我



们务必不要松懈自己的警惕性。”二十多年来，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在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中巩固和发展起来的。我们同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更是一次尖锐复杂的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抓住林彪鼓吹的“克己复礼”，深入地进行批判，就能进一步认清林彪这个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叛徒、卖国贼的真面目，认清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肃清其流毒。这对于我们坚持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反对复辟资本主义，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极为重要。

批判林彪的“克己复礼”，要联系现实的阶级斗争、两条路线斗争的大是大非问题。要批判林彪反党集团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否定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妄图复辟修正主义那一套的罪行，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继续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要批判林彪反党集团恶毒咒骂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种种谬论，坚持老、中、青三结合的原则，坚持无产阶级教育革命、文艺革命、卫生革命，坚持干部下放劳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要批判林彪反党集团妄图投靠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搞投降主义、卖国主义的罪行，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坚持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总之，要通过批判林彪的“克己复礼”，广泛深入地进行反修防修的教育，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使我们各项工作坚定地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前进。

批林批孔，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我们要认真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的著作，学习毛主席关于批林批孔的一系列指示和党中央规定的有关文件。这是我们战斗的武器。我们要把学习和批判结合起来，学好学通，批深批透。在批判林彪的“克己复礼”时，要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论著。这样才能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深刻地理解反对修正主义是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长期战斗任务，从根本上提高广大干部和群众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觉悟，提高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

各级党委和领导干部要站在运动的前列，紧紧掌握批林批孔这个中心，放手发动群众。要把革命大批判一步步地持久深入下去，防止纠缠于某些问题而冲淡批林批孔。要相信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锻炼的广大干部和群众，是能够掌握斗争的大方向的。只要我们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特别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对于具体问题要进行具体分析，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众，就一定能使批林批孔运动沿着正确的轨道胜利前进。

（原载一九七四年二月二十日《人民日报》）



孔子和林彪都是政治骗子

康 立

王明、刘少奇、林彪这类机会主义头子，都是一小撮政治骗子。如果我们穷根究底的话，在中国，他们的祖师爷应该推孔老二。研究孔老二这个历史上的骗子，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识别林彪这一类政治骗子。

大凡政治骗子，总有一套骗术。他们在骗人时都道貌岸然，信誓旦旦，装得一本正经。孔子和儒家之徒，明明是一批说假话的专家，但是在嘴上挂着的，或者在公开文书中写着的，总是一个“信”字。一部《论语》中，讲到“信”的地方有三十八处之多，什么“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论语·为政》），什么“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说来说去，无非是表示他们的说话是算数的。有一次，孔子由于经常言行不一而遭到了他的学生们的怀疑，他竟当着许多人的面，捶胸顿足，发誓赌咒地说：“你们这些小子，以为我对你们有什么隐瞒的吗？我对你们没有什么不可以公开的。这就是我孔丘的为人。”（《论语·述而》）其实，孔丘此人，历来是极不老实的。他公开宣称：做父亲的偷了羊，做儿子的应当替他隐瞒。反之，儿子犯了罪，父亲也应当替他隐瞒。这就是真正的“正直”（《论语·子路》）。看，这不是地地道道的政治骗子的逻辑吗？

孔子同一切政治骗子一样，把说假话，耍两面派，看作是做人的诀窍。他的学生中有个叫子贡的问他：什么样的人才可算“士”？孔子回答：只有那些维护奴隶制的忠臣、孝子才可称为“士”。至于“言必信，行必果”，说话算数，说到做到，那只不过是卑贱而又固执的“小人”罢了，根本不配当没落奴隶主阶级的谋臣（《论语·子路》）。总之，不骗人，就成不了“君子”，当不了野心家。他还公开鼓吹同党内部也要相互欺骗，说：“可以同他一起求学的人，未必能和他走同一条道路；能



和他走同一条路的人，未必能同他一起依礼而行；能同他一起依礼而行的人，未必能让他知道内情，参与机谋。”（《论语·子罕》）孔子认为，即使是同党也不能信任，必须各自心怀鬼胎，尔虞我诈。深得孔门心传的孟子，进一步发挥了这一政治骗术，厚颜无耻地提出：“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孟子·离娄》）。这就是说，凡是开历史倒车的“大人物”，说话不一定要兑现，行动不一定要做到。这是赤裸裸地提倡骗子哲学。反革命野心家、阴谋家林彪对这套骗术揣摩备至，心领神会。他把“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收辑在精心编纂的《四书集句》内，奉为至宝，并且宣扬：“谁不说假话，谁就得垮台”、“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由此可见，这伙政治骗子是依靠说谎混日子的。他们不说谎，就一天也混不下去。

在当时，奴隶起义的领袖跖曾经当面斥责孔子是“巧伪人”。“巧伪人”者，政治骗子之别名也。这种“巧伪”的特点，是由孔子所代表的没落奴隶主阶级的本性所决定的。孔子是个顽固地维护奴隶制的死硬派，一生鼓吹的是一条“克己复礼”的反动政治路线。他所玩弄的那套反革命两面派骗术，归根到底，是服从于这条反动的政治路线的。孔子要搞复辟，开历史的倒车，这是不得人心的。他周游列国，到处受逐，活象一条丧家之犬，只能靠政治欺骗混日子。但既要骗人，就难免不露出马脚。因此，他经常言行相违，处于不能自圆其说的窘境。鲁昭公娶了同姓的吴女做妻子，按照儒家的学说是符合“礼”规定的。但孔子为了庇护国君的声誉以维持奴隶制的统治秩序，硬是闭着眼睛说瞎话，强词夺理地说鲁昭公是知“礼”的君子（《论语·述而》）。理由呢？“臣不可言君亲之恶，为讳者，礼也。”明明是违犯了“礼”，却偏要说成是合于“礼”，还要说这样做的本身就是“礼”的组成部分。所谓“礼”的虚伪性和欺骗性，是很可以一目了然的。

在孔子身上，我们看到的是一个“阳奉阴违，口是心非，当面说得好听，背后又再捣鬼”的两面派形象。他表面上说什么“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不怕没有官做，就怕不懂得“礼”，不能自立于世）（《论语·里仁》），又说是什么“君子忧道不忧贫”（《论语·卫灵公》），装得十分清高；实际上三个月没有官做，便急得不得了，发牢骚说：“我又不是葫芦，怎么能挂起来光图好看而不能吃的呢？”（《论语·阳货》）他口口声声说什么“君子”“群而不党”（《论语·卫灵公》）。事实上，他培植和



训练了一批死党，形成了一个以复辟奴隶制为宗旨的小集团，对于这个集团里的人，稍不合己意，就立刻满脸杀气地叫嚣：“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论语·先进》）。孔子口头上唱的是“仁者爱人”的高调，说什么“为政，焉用杀”（《论语·颜渊》）；可是，他上台不到七天，就把主张革新的另外一个党派的代表人物少正卯给杀掉了。鲁迅对于孔子和孔子之徒的这种两面派行为曾辛辣地指出：“‘君子远庖厨也’就是自欺欺人的办法：君子非吃牛肉不可，然而他慈悲，不忍见牛的临死的觳觫，于是走开，等到烧成牛排，然后慢慢的来咀嚼。”“于是他心安理得，天趣盎然，剔剔牙齿，摸摸肚子，‘万物皆备于我矣’了。”（《病后杂谈》）

孔子不仅在政治上善于耍弄两面派手法，生活上也是一个极端虚伪而又无耻的家伙。孔子不是强调父母死了必须居丧三年的吗？但当他的老娘死掉以后，自己身上还在披麻带孝，一听到季氏家举行宴会，立刻急急忙忙赶去赴宴，结果被季家的执事阳虎赶了出去，说：“我们老爷请的是有头有脸的人物，没有你小子的份儿！”（《史记·孔子世家》）一顿臭骂给轰出门去。孔子不是强调什么“男女七岁不同席”的吗？可是他到卫国以后，由于求官心切，却偷偷走后门见了卫国国君的夫人南子，一进门就赶忙俯伏在地，连大气也不敢出，这副丑态见了实在叫人难受，连他的学生子路也对他老大不高兴。当时孔子只能象江湖上卖膏药的那样对天发誓：“我如果有不正之心，雷轰电劈”（《论语·雍也》）。孔子在口头上不是讲什么“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君子谋道不谋食”（《论语·卫灵公》）的吗？可是他在担任鲁国司寇的时候，年俸高达六万斗粟。衣、食、住、行，都十分讲究。论吃，“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盘子里的肉片要切得薄薄的。论穿，黑色的衣服要配紫羔皮，白色的衣服配鹿皮，黄色的衣服配狐皮，过的完全是奴隶主贵族的糜烂生活。明代的李卓吾一针见血地指出，孔子生活这么豪华，说“圣人”不要富贵是骗人的。章太炎也说：“儒家之病，在以富贵利禄为心”。这是很能刻画出孔子的伪君子的残忍而又阴险的嘴脸来的。事隔两千多年，孔老二的信徒林彪也学得了这一套。林彪和他的死党相互吹捧什么“温文、豪放、理智”，实际上从思想、政治到生活，都彻头彻尾资产阶级化了，烂透了。林彪所信奉的完全是地主资产阶级的人生哲学，他的内心世界，和孔子一样，是极其肮脏丑恶的。



孔子是政治骗子。儒家之徒在反动孔学的熏陶下，学得了一身虚伪而又阴险的好本领，都是一小撮政治骗子。

西汉初年，封建统治者奉行的是法家的政策。汉高祖不信儒。文帝、景帝实际上信奉的都是法家的一套。汉武帝接纳了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当时有很多人对此不以为然。汲黯对汉武帝说：“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史记·汲郑列传》）这实际上就是批评汉武帝尊儒反法，做得不对。其实，汉武帝对法家倒是并不嫉视的，他所任用的官吏如桑弘羊等，大都是奉行法家主张的。这种情况正如汉宣帝所说的：“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汉书·元帝纪》）。

信奉孔孟之道的儒生当大官的越多，官场风气也就越虚伪腐败。汉宣帝时有个儒生叫陈万年的，就极善于奉承拍马，讨得了丞相丙吉的欢心，做到了御史大夫的高官。他生病的时候，要他的儿子陈咸在床边听他的训话，絮絮叨叨地一直讲到半夜。陈咸越听越烦，越听越倦，最后不禁打起瞌睡来了，一头撞着屏风，头上起了个疙瘩。这一下，陈万年恼火极了，要举起棍子打他，说：“老子苦心教训你，你反而打瞌睡，不听我的话，是何道理？”陈咸回答说：“大人说的，儿子都听明白了，不过是教我如何奉承拍马罢了。”（《汉书·公孙刘田王杨蔡陈郑传》）这几句话，倒是颇为淋漓尽致地说破了所谓儒生、儒吏们的真面目。

在西汉的统治者中，真正信奉儒家学说的是汉元帝。他当太子的时候，一再劝他的父亲汉宣帝要任用儒生，结果挨了汉宣帝的一顿批评，汉宣帝叹气说：“乱我家者，太子也！”（《汉书·元帝纪》）事实也确如汉宣帝所说的那样，元帝是个既愚蠢而又死要面子的皇帝。他的老师肖望之是个有名的儒学大师，元帝对他推崇备至，十分信任。但当时宦官弘恭、石显与肖望之有矛盾，奏告元帝说：肖望之“为臣不忠”，应当“召致廷尉”。“召致廷尉”是进监狱的别称，元帝根本不懂得这层意思，却不懂装懂，稀里糊涂地批准了这道奏章。后来汉元帝发现肖望之进了监狱，不禁大吃一惊。要宣布肖望之无罪吧，等于承认自己无故处罚老师的罪名，面子上下不来。特别是弘恭、石显两个人，提出了儒家的为尊者讳耻的原则，竭力反对肖望之官复原职。汉元帝只得打肿脸充胖子，将错就错，索性把肖



望之撤职罢官。后来，元帝一面说要尊师重道，下诏说：“国之将兴，尊师而重傅”（《汉书·元帝纪》），准备任用肖望之为宰相，一面却又听信弘恭、石显的主意，把肖望之又一次关进监狱。肖望之老泪纵横，仰天长叹，服毒自杀了。汉元帝得知后，哭了一场，骂弘恭、石显说：“果然杀吾贤傅！”（《汉书·肖望之传》）其实，汉元帝有什么好埋怨的呢？凶手就是他自己，就是他所信奉的孔孟之道。肖望之死得也是活该，谁叫他用儒家的理论来培养与熏陶汉元帝的呢？结果呢，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汉元帝用肖望之教他的这套孔学来对待肖望之，肖望之就受不了了，只得到阴间去找“孔圣人”诉冤去了。

西汉的政治以汉元帝为转折点，此后一直走下坡路。《汉书》的作者班固评论汉元帝说：“少而好儒，及即位，征用儒生，委之以政，贡（禹）、薛（广德）、韦（贤）、匡（衡）迭为宰相。而上牵制文义，优游不断，孝宣之业衰焉”（《汉书·元帝纪》）。这话是有道理的。凡是尊奉儒家的，总是讲究繁文缛节，搞形式主义的一套。汉宣帝是不信儒的，他骂儒家之徒说：“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汉书·元帝纪》）元帝一反宣帝的行事，尊儒反法，结果汉朝的政治越搞越糟，元、成、哀、平四朝，一代不如一代。尊儒的结果，是西汉的灭亡。

在东汉，由于封建统治者继续提倡孔学，尊儒反法，读经成了升官发财的捷径，知识分子中的风尚极其虚伪、腐败。当时有个儒生叫许武的，在他自己被举为孝廉后，和两个兄弟串通，演出了假分家的丑剧，要他的两个弟弟假装“让产”，使他们获取美名，也得被举为孝廉。最后，许武又大会宾客，宣布自己为使两弟成名而有意蒙受贪财的恶名的苦心，从而获得了比以前更高的名声。《今古奇观》有一则《三孝廉让产得高名》的故事，就是根据这桩事实铺陈叙说而来的。从这桩被地主阶级引为美谈的事实中，可以看出所谓儒生，是一群自欺欺人的政治骗子，为了向上爬，完全可以不择手段。又如赵宣葬父母，在墓道中居住达二十多年之久，名震遐迩，成为轰动一时的大孝子。朝廷屡次请他出来做官，他却坚持在墓道中守孝，孝名愈来愈大。后来一查，他在墓道中连续生了五个儿子，



这一下骗局方才被揭穿。鲁迅说得好：“拚命的劝孝，也足见事实上孝子的缺少。而其原因，便全在一意提倡虚伪道德”（《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

汉代的劳动人民，对儒生这种虚伪无耻的行为作了尖锐的揭露和批判。当时有首民谣说：“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在人民群众的眼中，以清流自居的儒生却是浊如泥的。其实，就是地主阶级内部的进步思想家，也瞧不惯儒家之徒这种虚伪无耻、掩耳盗铃的欺世行径。在西汉，法家桑弘羊批判儒生是“饰虚言以乱实，道古以害今”。在东汉，王充针对汉代的社会风尚指出：“俗儒守文，多失其真”。王符在《潜夫论》中批评汉代儒者是“言方行圆，口正心邪，行与言谬，心与口违”，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两面派、政治骗子。到了汉朝末年，信奉法家的曹操对这批虚伪无耻的儒士深恶痛绝，一再表示“吾欲整齐风俗”，对汉代儒生的歪风邪气进行了坚决的打击。

在中国封建社会中，随着地主阶级的逐步由真老虎变为纸老虎，孔子在思想界确立了至高无上的地位。到了宋代，出现了以“伪学”著称的道学。程颢、程颐和朱熹等人把孔孟之道发展成为程朱理学，成了封建社会后期的统治思想。特别是朱熹，他编纂了《四书集注》、《通鉴纲目》来对孔学进行发挥，影响极大，流毒甚广，是反动理学的集大成者。就是这个朱熹，由于深得孔学真传，是一个典型的两面派、伪君子。他为了泄私愤，对无告的官妓严刑拷打，阴谋搞政治陷害。他平时口口声声“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但听说建阳县学堂风水好，就用粗绳大索把孔子塑像捆绑起来搬走，结果把孔子的手脚也搞断了，闹得舆论哗然。他口口声声“百行孝为先”，但虐待老母，自己吃好米，给他的母亲吃发霉的米。其实，道学家都是一批寡廉鲜耻的伪君子、真小人，又岂仅是朱熹而已！元朝一建立，南宋的那批道学家纷纷卖身投靠，比谁都要积极。因此，元朝也是崇儒的，官方修的宋史就列了专门的章节来给宋代的道学家树碑立传。明代的李贽曾经辛辣地讽刺道学家说：“阳为道学，阴为富贵，被服儒雅，行若狗彘然也。”（李卓吾：《初潭集》卷十一）李贽本人是从儒家营垒中杀出来的，对其中的黑幕了解得比较清楚，因此，他直率地指斥这批道学家的行为简直同猪狗一样。



孔子及儒家之徒的两面派、伪君子的虚伪行径，反映了没落阶级处于没落境地中所采取的垂死挣扎的手法。因此，历史上一切没落阶级要搞复辟、开倒车，就都要尊孔学、学孔学，向孔子这个政治骗子的祖师爷顶礼膜拜。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林彪，就是孔老二的忠实信徒。他全盘继承了从孔孟到朱熹的骗人衣钵，是一个“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的两面派、伪君子。他亲自编纂了《四书集句》，抄录背诵，身体力行。他还公然标榜要学习朱熹的“待人”哲学。长期以来，他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志壮坚信马列”的“英雄”，实际上却是一个假马克思主义的政治骗子。他抄录《三国演义》中的一首诗：“勉从虎穴暂栖身，说破英雄惊煞人。巧借闻雷来掩饰，随机应变信如神。”充分暴露了他反革命两面派的面目。他把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当成“虎穴”，只是勉强地暂时地“栖”一下，到一定时候就要搞反革命政变，要杀人，要复辟地主资产阶级专政。他的野心极大，不能“说破”，即不能公开，不能见太阳，只能在阴暗的角落里同一小撮死党去阴谋策划。用什么方法能不被识破呢？就是“随机应变”，即随着形势的变化相应地进行不断的投机，以欺骗人民，欺骗党，用表面的伪装的“变”来“掩饰”他不变的资产阶级野心家的本质。他刻骨仇恨在毛主席领导下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批判修正主义、批判孔孟之道的中国革命人民，这种仇恨是地、富、反、坏、右对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阶级仇恨。它集中地表现在反革命武装政变计划《“571工程”纪要》当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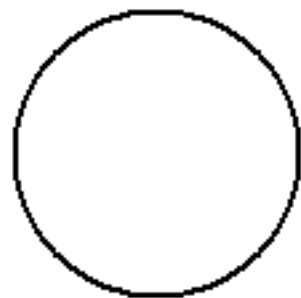
但是，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顽固派，他们总有一套计划，其计划是如何损人利己以及如何装两面派之类。但是从来的顽固派，所得的结果，总是和他们的愿望相反。他们总是以损人开始，以害己告终。**”无论是孔子还是林彪，都逃脱不了这样的下场。今天，随着批林批孔的深入，我们彻底批判孔子及儒家之徒的两面派行为，可以增强我们识别林彪之流的假马克思主义骗子的能力，将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原载《学习与批判》一九七四年第二期，

本刊转载时略有改动）



秦统一六国起决定作用的是什么？



辽宁大学 李 时

秦始皇是我国古代新兴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他尊法反儒，厚今薄古，坚持革新，反对倒退，在中国历史上起了促进统一的进步作用。但两千多年以来，地主资产阶级中的尊孔派，都竭力抹煞秦始皇的历史功绩。叛徒、卖国贼林彪同样用孔孟之道肆意歪曲历史。他借咒骂秦始皇来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反对社会主义道路，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今天，关于秦始皇历史作用的评价问题，不仅是史学领域中的重要课题，而且是政治战线上的一场严肃的阶级斗争。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在奴隶们反抗奴隶主贵族的剧烈的阶级斗争中，在新兴地主阶级同没落奴隶主阶级的反复较量过程中，地主阶级专政逐步代替奴隶主阶级专政，进一步统一中国成了当时广大人民的要求。秦始皇统一六国，适应了人民群众要求统一的愿望，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建立了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地主阶级专政的国家。

秦始皇能完成统一，就秦王朝本身来说，起决定作用的究竟是什么？是由于个别将领的能征善战呢，还是由于有一条符合历史发展的政治路线？如果把秦统一六国的功绩都归于秦将王翦、王贲父子，认为与秦始皇无关，或以此来贬低秦始皇，那就从根本上违反了历史事实，否定了政治路线的决定作用。对于这个重大的历史问题，必须根据客观的事实，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分析，恢复其历史的本来面目。

秦统一六国，是符合历史发展的规律的。战国时期，封建制正在代替奴隶制。



反对奴隶主贵族残余势力的篡权复辟，铲除封建割据的诸侯王国，巩固和发展封建制度，是当时历史发展的总趋势。自秦孝公至秦始皇，秦坚持了一条变法革新的政治路线，适应了历史的发展。秦孝公用商鞅变法，打击奴隶主贵族势力，建立起各项封建的政治、经济制度，实行“奖军功”、“教耕战”等政策，“劝民耕农利土”，“习战陈之事”^①，“外连衡而斗诸侯”（“对外实行‘连横’政策而使诸侯各国自相争斗”）^②。从此，新兴地主阶级开始掌握了政权，经济力量迅速增长，军力日益强大，“秦之锐士”远远胜过“齐之技击”、“魏氏之武卒”^③，并且“南取汉中，西举巴、蜀，东割膏腴之地，北收要害之郡”，“宰割天下”^④。到秦始皇时，秦国经历了六世，一百余年，在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都比东方六国占着绝对的优势，由原来落后、贫弱的地位，一跃而成了战国七雄中最先进、最富强的诸侯国，具备了统一六国的有利条件。当时“三晋”（韩、赵、魏）的很多劳动人民都跑到秦，从事生产和当兵；东方六国的一些新兴地主阶级人士如李斯、尉繚等纷纷投奔到秦，做“客卿”，为秦谋划统一。这都说明当时的人心向着先进的秦国，希望由它完成统一。但在秦始皇即位初年，相国吕不韦掀起复辟逆流。他继承孔子“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的反动思想，主张分封诸侯，妄图复辟奴隶制，并把早已灭掉的卫国重新恢复起来。这是对历史的反动。秦始皇于公元前二三八年亲政之后，打倒了吕不韦、嫪毐反动集团，是一次法家改革路线的重大胜利，这就为统一六国扫清了道路。

与此同时，六个诸侯国虽都在不同程度上向封建地主阶级专政转化，但由于没有坚持或彻底实行社会改革的政治路线，因而谁也没有力量起来统一中国。楚国幅员最大，人口最多，兵数最众，公元前三八一年吴起变法失败之后，掌握军政大权的始终是昭、景、屈等大贵族，“大臣父兄，好伤贤以为资，厚赋敛诸臣百姓”^⑤，统治者倒行逆施，社会矛盾重重，民不聊生。赵国在武灵王时期，改革军制，“胡服骑射”^⑥，兵力比较强大，而政治、经济却没有相应改革，赵氏宗族专政，“上下不相亲”、“贵贱不相信”^⑦，各种社会矛盾也很尖锐，怨声载道。魏国在战国初期，因李悝变法，“尽地力之教”^⑧，虽曾盛极一时，但过了不久，旧



贵族势力抬头，“平余法”等政策不能继续贯彻下去，国力就逐渐衰退了。齐国，地主阶级掌权虽早，也有过一些改革，但是他们受儒家思想影响较深，田氏宗族势力也很大，以致未能使改革进行到底。韩国的改革也不彻底，象著名法家韩非的政治主张并没有被实行。至于燕国，基本上就没有什么改革。这些诸侯国旧贵族势力专权比较普遍，楚春申君、赵平原君、魏信陵君、齐孟尝君等贵族奴隶主代表人物“方争下士，招致宾客，以相倾夺，辅国持权”^⑨。由于这些诸侯国的政治、经济、军事都不象秦国那样蒸蒸日上，加上他们只顾各自的利害，不可能真正实现什么“合纵”，在互相攻伐中又大大削弱了国力，最后只能被秦所消灭。

由此可见，战国七雄对峙的时候，秦国由弱变强，并不是偶然的。正如荀子所说：秦国“四世有胜，非幸也，数也”^⑩。就是说，这不是什么碰运气的偶然现象，而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同时，其它六国由强变弱，也不是偶然的现象，而是有历史根由的。秦始皇“续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⑪，六国“为秦人积威之所劫，日削月割”^⑫，终于导致了秦的胜利，六国灭亡。这个历史事实充分说明，秦统一六国，不能孤立地归结为个别将领的作用，而是由于秦始皇代表了新兴的地主阶级，他所实行的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的政治路线起了决定作用。

毛主席指出：“‘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在这点上说，战争就是政治，战争本身就是政治性质的行动，从古以来没有不带政治性的战争。”这就告诉我们：自古以来，军事路线同政治路线总是紧密相联的。政治路线决定了军事路线，军事路线为政治路线服务。秦始皇统一六国的军事路线是为加强新兴地主阶级统治的政治路线所决定的，并为后者服务的。

秦始皇根据他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采纳了著名法家李斯、尉繚的建议，制定了统一六国的战略部署。首先，发动强大的政治攻势，派姚贾等人出使并粉碎了六国诸侯的“合纵”政策^⑬；接着“乃使其良将随其后”^⑭，集中优势兵力，一个一个地攻打六国。他的作战部署是，从取韩开始，再南北出击，破赵、燕，灭魏、楚，横扫两翼，然后歼灭齐国。攻“三晋”和燕、楚时，使人劝齐王放弃“合纵”政策，“不助五国攻秦”^⑮。秦始皇这一作战部署，贯彻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远交



近攻”的战略方针。韩、魏是“天下之枢”^⑩，“塞秦之冲，而蔽山东之诸侯”（“堵塞着秦国的要道，而掩护着华山以东的其他几个诸侯国”）^⑪。特别是韩，乃秦的“心腹之病”^⑫。如果燕、齐、楚、赵等国联合起来支持韩、魏反秦，“则胜负之数，存亡之理，当与秦相较，或未易量”^⑬。鉴于这个形势，秦国自孝公以来，多次用了“远交近攻”的战略方针，“商鞅用于秦，而收魏”，“范雎用于秦，而收韩”^⑭。这样，秦国能够粉碎六国“合纵”的战略，利用敌方矛盾，各个击破，得寸有寸，得尺有尺。秦始皇根据新的形势，继承了早就行之有效的这个“远交近攻”的战略方针，进军神速，自公元前二三〇年灭韩开始，到公元前二二一年灭齐结束，十年之内，“并吞战国，海内为一”^⑮。

六国诸侯面对秦国强大的军事、政治攻势，他们除调动所有军队进行顽抗之外，还施展各种阴谋诡计作垂死挣扎。燕太子丹妄想颠覆秦国，重振诸侯，秘密派了亡命徒荆轲窜到秦国去谋刺秦王。齐王建派人到秦国，妄图离间秦国君臣，进而瓦解秦国。这种搞暗杀、挑拨离间的卑鄙手段，是没落阶级的阶级本性及其反动政治路线的必然表现。结果，他们都没有得逞。燕太子丹导演了“荆轲刺秦王”这种孤注一掷的阴谋暗杀，既挽救不了反动奴隶主阶级的灭亡，也阻止不了新兴地主阶级走历史的必由之路，而且只能以荆轲“一去兮不复返”而告终^⑯。去到秦国的齐客，反过来为秦国服务，“劝（齐）王朝秦”^⑰，加速了齐国灭亡。这些腐朽没落的奴隶主阶级的反动人物，战场上一败涂地，阴谋诡计又遭败露，终究免不了一朝覆没。

秦始皇非常重视统一六国的战争，亲自部署和领导了这场战争。他在关键时刻，于公元前二三四年“之河南”，公元前二二八年“之邯郸”，公元前二二四年“游至郢、陈”^⑱，三次亲临前线指挥战斗，促进了战争的胜利。同时，又在军事胜利的过程中，为了巩固战果，采取了一个重大的政治措施，即把灭掉的诸侯国改设为郡县，把新占领区内的奴隶主贵族和大商人迁徙到容易控制的地方或边远地区，扩大了封建主义中央集权。秦始皇实现“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⑲，建立起中央集权的统一的封建国家，是他的军事路线的胜利，更重要的



也是他的政治路线的胜利。

王翦、王贲父子等在秦统一六国的战争中，打了几个胜仗，主要是因为秦始皇战略指挥的正确。当秦楚之战，李信等人带领二十万秦军首战告捷，随后遭到楚军袭击而挫败时，秦始皇派王翦带六十万大军继续击楚，楚用全部兵力抵抗秦军。当时的战略形势是：秦已取得灭韩、魏的胜利，无后顾之忧，兵强马壮，秦始皇敢于集中兵力，以逸待劳；而楚军则以劳对逸，陷入困境，难以持久，“乃引而东”。于是王翦挥军追击，“大破荆（楚）军”^②。当然，王翦个人在这一战役中，是有作用的，但他这个作用也只有秦始皇统一六国的正确战略指挥下才能充分发挥出来。试想：没有“远交近攻”的战略，没有秦始皇的统筹全局，没有秦军早已取得灭韩、魏，破赵、燕的胜利，王翦个人能在这一战役中取胜吗？没有雄厚的经济实力，源源不断的粮草供应，王翦以逸待劳的战术能行得通吗？没有秦国稳定的政治局面，巩固的地主阶级专政，王翦一人能打败强敌吗？一句话，没有符合历史发展的政治路线，单凭王氏父子那样几名将领能打出统一的天下吗？不能，“**战争一刻也离不了政治**”。离开了秦始皇的法家改革路线来谈论王氏父子的战功，就是离开了政治来谈论战争，这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点是背道而驰的。

政治路线的正确，决定了秦统一六国的战争最终必胜。但以王翦个人来说，并不是也不可能是“常胜将军”，他领兵打过胜仗，也打过败仗。公元前二二九年，王翦攻赵，“赵使李牧、司马尚御之，李牧数破走秦军。”^③当时王翦受挫，一年内没有多大进展。后来，由于秦始皇发动了强大的政治攻势和军事攻势，一方面从内部分化瓦解敌方，一方面大举进军，猛烈攻击，才取得了平赵战争的胜利。

然而，王翦没有自知之明，往往居功自傲，甚至要挟秦始皇。公元前二二六年，王翦攻下燕都蓟城之后，便“谢病老归”^④。公元前二二四年，秦始皇为了灭掉实力比较强大的楚国，“复召王翦”，要他带六十万大军击楚。王翦开始推辞不干，勉强答应后，又向秦始皇“请美田宅园池甚众”。秦始皇好言抚慰他，他却不听，对秦始皇说：“为大王将，有功终不得封侯，故及大王之向臣，臣亦及时以



请园池为子孙业耳。”大军已经出发，他还三番五次地讨价还价。王翦以功臣自居要挟秦始皇达到了这样严重的程度，当时就有人不满地对他说：“将军之乞贷，亦已甚矣！”^②秦始皇并没有迁就王翦这种刚负重任就多“请田宅”的无理要求，只付之一笑^③。他既坚持了法家的“论功行赏”的原则，又没有使王翦失去立功的机会，继续信用他。所谓“翦为宿将，始皇师之”^④，就反映出秦始皇起用已经退出战场的老将，发挥他的作用，有其任人唯贤的政治原则。

其实，在战国时期要论名将，王翦父子还不能名列前茅。如廉颇就是战国时期少有的名将，他曾屡次打败过齐军，两度攻拔过魏地，也曾大破燕军取得五城，还在长平抵御过秦军，“以勇气闻于诸侯”^⑤。可是，为什么廉颇不能象王翦父子那样在统一六国的战争中立功呢？归根结底，是因为赵国的政治路线不正确，社会改革不彻底，赵王任人唯亲，旧贵族逆历史趋势而动，没有秦国那样的经济、政治和军事等条件，廉颇也就发挥不了什么作用。再如李牧，曾与廉颇齐名，同为赵国名将，有谋有勇。他曾“北逐单于，破东胡，灭澹林，西抑强秦，南支韩、魏”^⑥。就征善战而言，王翦与李牧相比，无论军事谋略，还是勇猛冲杀，都差一筹。李牧在赵国虽有战功却未能善终，最后因赵王受人挑拨而被杀掉了；而王翦在秦国则能为统一六国而战，做出了一定的历史贡献。这从正、反两个方面都说明：在阶级斗争中个人是受一定的政治路线支配的。政治路线对了，将领的作用可以得到发挥；政治路线错了，将领还能发挥啥作用？不仅“英雄无用武之地”，甚至还会垮台！

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社会变革，归根到底，就是新兴的阶级战胜没落的阶级。秦始皇统一中国的历史，就是新兴地主阶级战胜旧奴隶主贵族的阶级斗争史，也是改革彻底的国家战胜改革不彻底的国家的历史。秦之所以能消灭六国，实现统一，并不是由于王翦父子起了决定作用，而是由于秦始



皇所代表的坚持革新、坚持统一、坚持进步的政治路线战胜了主张倒退、主张分裂、主张复辟的反动路线。这里，如果把将领个人看做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那就是英雄创造历史的唯心史观。

无产阶级作为历史上最先进最革命的阶级登上政治舞台，实现彻底推翻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用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的伟大历史任务，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各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而产生的正确的革命路线起决定作用。毛主席指出：“一个政党要引导革命到胜利，必须依靠自己政治路线的正确和组织上的巩固。”这是在革命实践中经过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反复证实了的真理。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结果。叛徒、卖国贼林彪，顽固地坚持反动的唯心史观，鼓吹英雄创造历史，把党和人民在毛主席正确路线指引下创造的丰功伟绩窃为己有，就是妄图改变党的路线，推行他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篡党夺权，投靠苏修，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林彪开历史倒车，结果被前进的历史车轮轧得粉碎。当前，在继续深入批林批孔的伟大运动中，我们一定要坚持唯物史观，反对唯心史观，彻底批判林彪路线的极右实质，提高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自觉性，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注：

①⑩⑬ 《史记·范雎蔡泽列传》

②④⑪ 贾谊：《过秦论》

③⑫ 《荀子·议兵》

⑤ 《战国策·楚策三》

⑥ 《史记·赵世家》

⑦ 《战国策·秦策一》

⑧ 《史记·孟子荀卿列传》

⑨ 《史记·春申君列传》

⑫⑱ 苏洵：《嘉祐集》卷三《六国》

⑬ 《战国策·秦策五》

⑭ 《史记·李斯列传》

⑮ 《史记·田敬仲完世家》

⑰⑲ 苏辙：《栾城应诏集》卷一《六国论》

⑲ 《史记·平原侯主父列传》

⑳ 《史记·刺客列传》

㉑ 《战国策·齐策六》

㉒㉓㉔ 《史记·秦始皇本纪》

㉕㉖㉗㉘ 《史记·白起王翦列传》

㉙ 《战国策·赵策四》

㉚ 《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

㉛ 《史记·张释之冯唐列传》



批林批孔是反修防修的伟大斗争

燕 枫

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领导下，一个声势浩大的批林批孔群众运动，正在全国范围内蓬勃兴起。这是上层建筑领域里一场意义深远的革命，是关系到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斗争。

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党内不可避免地存在着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的斗争。国内被推翻的地、富、反、坏、右，想恢复他们失去的天堂，总要在我们党内寻找修正主义者作为自己的代理人；国际上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图谋颠覆和侵略我们社会主义祖国，也要收买那些甘当儿皇帝的里通外国分子。因此，获得解放的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为了巩固经过流血牺牲得来的政权，必须坚决镇压明火执仗的阶级敌人的破坏和捣乱，更必须时刻警惕和粉碎修正主义头子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活动。

历史经验表明，在中国的具体条件下，凡是搞修正主义的，往往要向孔学的垃圾堆里寻找反革命的思想武器。党内修正主义路线的头子，从陈独秀、王明，到刘少奇、林彪，他们同我国历史上的反动派一样，都是尊孔的，都是孔家店的门徒。在当前的情况下，把批林和批孔紧密地结合起来，彻底批判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和孔孟之道，弄清修正主义头子为什么总是要尊孔及其尊孔的政治目的，对于坚持反修防修的伟大斗争，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林彪反党集团是修正主义的一面镜子。林彪利用孔孟之道对抗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真理，为其反革命的复辟活动服务，是极为猖狂的。在政治路线上，林彪接



过孔老二“克己复礼”的口号，作为他改变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反动纲领，妄图让地、富、反、坏、右重新上台，恢复地主买办资产阶级的专政。在思想路线上，林彪把孔老二的“天命论”、“生而知之”等一套唯心论的先验论，以及“上智下愚”的唯心史观拿过来，改头换面，炮制了反党理论纲领——“天才论”，自比“天马”，以“至贵”、超人自居，无耻地宣称自己的“美德”“受于天”，以此作为建立封建法西斯林家王朝的精神支柱。在组织路线上，林彪用孔孟的反动处世哲学，大搞阴谋诡计，结党营私，甚至发展到训练法西斯的特务队，要他的死党为“林家王朝”的反革命事业效忠、“成仁”。大量事实证明，孔孟之道是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一个重要思想来源，林彪是地地道道的孔老二门徒。

林彪一类修正主义路线的头子，在加紧推行修正主义路线、进行反革命活动的时候，为什么都要抬出孔丘来顶礼膜拜，并拾取其思想破烂作为旗帜向党进攻？只要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历史地、具体地加以分析，就不难找到答案。

从孔丘思想的实质来看，就是反对改革，坚持复辟，反对前进，主张倒退。这正适合于修正主义者反对革命、反对人民、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需要。孔丘作为反动奴隶主阶级的思想家，他的思想体系，本来是为复辟日趋崩溃的奴隶制、开历史倒车服务的。以后，经过历代统治阶级的不断加工改造，强制推行，孔孟之道逐渐成为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直到新中国建立之前，两千多年来中国社会虽然发生了很大变化，然而“**社会上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剥削却是过去各个世纪所共有的事实。因此，毫不奇怪，各个世纪的社会意识，尽管形形色色、千差万别，总是在某种共同的形式中运动的**”。（《共产党宣言》）孔孟之道作为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尽管历代统治阶级从自身的需要出发，从不同的方面作了解释和发挥，它的本质始终是主张倒退反对进步，主张保守反对革新，主张复辟反对革命。孔丘的思想体系一直忠实地为维护旧制度服务，为被推翻的反动阶级和反动派搞复辟效劳。反动统治阶级用来维护剥削制度的理论、纲领，许多在孔学中得



到体现。所有这些，是同修正主义者搞反革命的倒退，搞资本主义复辟的政治要求完全吻合的。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总是要到孔学中去寻找思想武器，向党和无产阶级进攻的一个原因。

从中国近代和现代历史的发展事实来看，孔学被修正主义头子看中并加以利用，也有其客观的社会基础。“修正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想。”修正主义者是资产阶级在我们党内的代理人，他们主张并推行资本主义路线，一般地说，要以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但是，由于中国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十分软弱，而“**这个阶级的文化思想却比较它的政治上的东西还要落后**”，始终没有形成完整的、独立的可与封建文化思想相匹敌的思想体系。在辛亥革命前后到五四运动的一个短暂的时期里，资产阶级的所谓新学，虽然在旧时期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的推动下，一度反对过孔家店，有同中国封建文化作斗争的作用，可是，因为资产阶级思想的无力和世界已经进到帝国主义时代，它上阵还没有打上几个回合，“**就偃旗息鼓，宣告退却，失了灵魂，而只剩下它的躯壳了**”。随着无产阶级登上中国革命的政治舞台，同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思想相抗衡的，是帝国主义文化和半封建文化。“**帝国主义文化和半封建文化是非常亲热的两兄弟，它们结成文化上的反动同盟，反对中国的新文化。**”（《新民主主义论》）中国的买办资产阶级，以及民族资产阶级的右翼，成了帝国主义奴化思想和尊孔读经的封建复古思想的维护者和鼓吹者。林彪这个修正主义头子，要想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变为地主买办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也就不能不从大地主大资产阶级那里，继承这个“尊孔读经”的衣钵。

林彪特别看重孔孟之道，是因为在中国的具体情况下，这种思想更能欺骗人。它满纸“仁义道德”，骨子里是“压迫有理”、“剥削有理”；它假惺惺宣扬什么“爱人”，实质上是主张成千上万地“吃人”。历代的剥削阶级正是利用孔学来欺骗和愚弄人民，以维护和巩固其反动统治的。列宁说过：“**所有一切压迫阶级，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都需要有两种社会职能：一种是刽子手的职能，另一种是牧师的职能。**”（《第二国际的破产》）孔孟之道的欺骗性，就表现在它给刽子手穿上



了牧师的服装。在社会主义时代，地主资产阶级虽然被打倒，但他们在思想文化领域还有势力，还要和我们反复较量，靠什么呢？一个重要方面就是靠孔孟之道，靠这种反动思想的流毒和影响。这是他们用来向无产阶级进行夺权斗争的思想武器。修正主义分子是以伪装出现的反革命，是一伙政治骗子，他们既要搞反革命活动，又要骗人，孔老二的一套颇合他们胃口，于是就被他们奉为至宝。

修正主义是一种国际现象。从国际范围的阶级斗争来看，王明、刘少奇、林彪等修正主义头子大肆宣扬和贩卖孔孟之道，完全适应了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反华反共反人民的需要。历史上的外国侵略者，为了征服我国人民，在实行野蛮的军事侵略的同时，往往要抬出孔老二，利用以孔孟之道为核心的中国固有的反动腐朽的旧文化，作为他们殖民统治的思想工具。正如鲁迅所指出的：“我以为如果外国人来灭中国，……是还要奖励你多读中国书，孔子也还要更加崇奉”。（《报〈奇哉所谓……〉》）这是因为，在他们看来，孔孟之道是中国的“国粹”，是一把使人“割头不觉死”的“软刀子”，深深打上了中国历代统治阶级统治经验的印记，更具有欺骗、麻醉中国人民的作用。在抗日战争期间，日本帝国主义者不是曾经疯狂叫嚣建立“东亚新秩序”，就是要“恢复孔子之教”吗？长期以来，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分子不是也在大搞尊孔丑剧，大骂秦始皇吗？他们无耻宣传孔丘是中国的“至圣先师”、“万世师表”，胡说什么“儒学”是“中国独一无二的文化珍品”，“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等等。这些，都说明外国和中国的反动派唱的是一个调子，都从反面揭露了孔丘思想的反动实质。林彪是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奴才和走狗，他决心投靠苏修，充分表明他是准备要当儿皇帝的。今天，我们针对林彪利用孔孟之道搞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进行深入的批判，也就沉重地打击了苏修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的狂妄野心。

恩格斯曾经指出：“传统是一种巨大的阻力，是历史的情性力，但是由于它只是消极的，所以一定要被摧毁”。（《〈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版导言》）旧中国绵延几千年之久的孔学，是典型的剥削阶级传统，它的反动性和腐朽性，



成为社会发展的巨大阻力，必然要被滚滚向前的历史车轮所摧毁。中国近代史上一些逆历史潮流而动的“英雄”“好汉”，都曾“把孔夫子当作砖头用，但是时代不同了，所以都明明白白的失败了”。（鲁迅：《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搞尊孔的修正主义头子也无一例外，他们都“明明白白的失败了”。林彪这个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卖国贼，妄想用孔老二这块砖头“敲”开资本主义复辟之门，阻挡历史走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结果摔死在蒙古沙漠上，成了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

林彪和孔丘，虽然生长时代不同，所代表的阶级力量也不同，但他们所执行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有相同之点。他们都站在腐朽没落的剥削阶级立场上，顽固地要恢复已经灭亡的旧制度，力图阻挠社会按照自己的发展方向前进。因此，我们今天的批林批孔斗争，是一场严肃的政治斗争，一场深刻、尖锐的路线斗争。斗争的实质，就是搞马克思主义还是搞修正主义，坚持革命还是搞复辟的问题。通过批林批孔的斗争，把林彪反党集团的思想、言论和行动同孔孟之道相对照，进行深入的剖析和批判，就可以使我们更深刻地了解修正主义的特点及其思想根源，了解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了解孔学的反动性，以进一步从思想上同它们划清界限，在今后同修正主义以及一切剥削阶级意识形态的斗争中，取得更大的主动权。

当前，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亿万工农兵作为批林批孔的主力军，正在口诛笔伐，向林彪反党集团及其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猛烈开火，向孔老二及其整个反动思想体系猛烈开火，为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传播和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茁壮成长，开辟着广阔的道路。在批林批孔斗争中，我们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学习毛主席关于反修防修的一系列重要指示，进一步掌握理论武器。我们每一个共产党员和革命干部都要带头参加批林批孔，在斗争中接受反修防修的教育，自觉地改造世界观。要经常想一想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要不断地总结两条路线斗争的经验，特别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的新鲜经验，使自己的思想适应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需要。让我们为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的伟大事业，积极工作，努力作战！



揭穿“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的反动实质

上海吴泾热电厂 郭企元
上海重型机器厂 黄士耀

叛徒、卖国贼林彪一伙为了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一再宣扬什么待人要“以仁爱之心”，“以宽宥原谅之恕”，“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谬论。这一套是从反动阶级的“圣人”孔老二那里拣来的腐朽货色。

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自己所不喜欢的东西，不要加到别人身上”。乍一听，是何等的迷人悦耳啊！可是，我们劳动人民通过自己长期切身痛苦的经验，早就看穿了这种谬论的反动本质。

马克思列宁主义告诉我们：自有文字记载以来，人类社会的历史，是一部阶级斗争的历史。在阶级社会里，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之间，存在着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不是剥削阶级压迫、剥削被剥削阶级，就是被剥削阶级起来打倒剥削阶级，从来也不存在什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道”。剥削阶级之“欲”，必为被剥削阶级所“不欲”。反过来，也是一样。孔老二是“恕道”的发明人，可他实行过没有呢？没有。比如，“死”，这大概是孔老二所“不欲”的吧，那么他是不是不以“死”“施于人”呢？实际上，他却偏偏爱杀人，置人于死地而后快。这个满嘴“恕道”的“巧伪人”，就亲手制造了两起血淋淋的残杀事件：一是为了达到杀一儆百的目的，杀了革新派人士少正卯；二是为了维护奴隶主的尊严，下令残害了在齐鲁两国国君夹谷相会的会场表演节目的艺人。这证明，开口闭口“恕道”的孔老二，实际是个一点也不“恕”的法西斯刽子



手。奴隶主、地主和资本家所“不欲”的东西，是一定要“施于”奴隶、农民和工人的，历来是这样。奴隶主是不愿当奴隶的，却偏要广大奴隶世世代代作奴隶；地主、资产阶级是不愿作牛马的，却偏要广大农民、工人过着连牛马也不如的痛苦生活。在万恶的旧社会，我们工人都有一本血泪帐，挨皮鞭打，住滚地龙，吃猪狗食。资本家花天酒地的剥削阶级“欲望”越旺，施于我们工人的压迫剥削就越残酷。总而言之，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之间，是己所不欲要施于人，与孔老二的骗子哲学正相反。所以，一提起那个“恕道”，我们工人就怒火满胸膛。戳穿了看，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道”，就是欺人之道，吃人之道。

恕道、恕道，明明做不到，那为什么从孔老二到林彪都要提倡这一套呢？这自然也是有原因的。孔子讲“恕”，用之于奴隶主统治集团内部，是妄想要大家在所谓“礼崩乐坏”的残局面前同舟共济，死死地抱住奴隶制的旧秩序，为“复礼”而“克己”。用来对付奴隶们和当时新兴的地主阶级，则可以劝诱他们不要“犯上作乱”，不要变革，不要暴力革命，以维持正在急剧崩溃中的奴隶制。总之，讲“恕”是为了“复礼”，即复辟。孔子对奴隶们的反抗和新兴地主阶级的变革怕得要死，就用“恕”、“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一套来骗人，这实际上是一种阶级调和论，是麻醉剂。所以，后来的一切反动没落的统治阶级及其思想家，为了麻痹人民群众的革命意志，缓和激化了的阶级斗争，都喜欢提倡这个“恕道”。一切反动统治阶级对劳动人民从来没有实行过什么“恕道”，又决不肯将“恕道”束之高阁，而且越是残酷无情地镇压劳动人民的反动派，嘴里越是要念着“恕道”，这个秘密被鲁迅一针见血地揭穿了。鲁迅在一九三六年就说过：“只有明明暗暗，吸血吃肉的凶手或其帮闲们，这才赠人以‘犯而勿校’或‘勿念旧恶’的格言，——我到今年，也愈加看透了这些人面东西的秘密。”鲁迅所看透的这个“秘密”告诉我们，几千年来之所以总有一些人要抱住“恕道”招摇撞骗，原来是恶鬼装菩萨有这种特殊的需要。

列宁曾指出：“所有一切压迫阶级，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都需要有两种社会职能：一种是刽子手的职能，另一种是牧师的职能。”（《第二国际的破产》）从孔



老二到林彪的一切伪装菩萨的恶鬼，都是一身兼二任，既是刽子手，又是牧师。这些家伙讲“恕道”，是为了“使民杀而不怨”，是为了维护剥削阶级的利益和统治。

在旧社会，剥削阶级对我们劳动人民从来没有搞过什么“恕道”；在今天，在我们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新中国，我们对于被打倒的剥削阶级，能够讲“恕道”吗？不能。搞社会主义就是要消灭资本主义，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不抓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不打倒叛徒、卖国贼林彪之类的资产阶级代理人，就不可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将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林彪一伙对此怕得要死，于是就装出一副菩萨心肠，哼哼唧唧地念起“恕”经，宣扬什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妄图用这种腐朽的孔孟之道麻痹我们的思想，解除我们的思想武装，以便他们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什么待人要“以仁爱之心”，“以宽宥原谅之恕”，难道无产阶级能以“仁爱之心”待资产阶级，而不讲阶级斗争吗？对于国内外阶级敌人的破坏和捣乱，我们能报以“宽宥原谅”，而不加以反击吗？如果依了林彪一伙的话去做，对被打倒的地、富、反、坏、右讲“恕道”，搞什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那就意味着地主买办资产阶级的反革命专政复辟，意味着被打倒的反动阶级重新上台。这是我们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所绝对不能允许的。

无产阶级不需要隐瞒自己的观点，从来就公开表明对敌人是不施“仁政”，不讲“恕道”的。马克思主义的一条重要原则是，**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党内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们鼓吹孔老二的“恕道”，我们就一定不能对敌人讲“恕道”；他们抬出孔老二来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就一定要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根本利益相反，欲望相反，一个要走社会主义道路，一个要走资本主义道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关系只能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关系，**决不可能**有什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对于无产阶级专政，一切反动派不用说当然是“不欲”的，而我们革命人民则必强“施于”他们，这是毫无疑义的。



从“天马”的下场看天命论的破产

内蒙古阿巴嘎旗 乌云格日勒

林彪是孔老二反动天命论的鼓吹者。两千多年前，奴隶主贵族的代言人孔老二编造了一套“天命”的胡说，自吹“知天命”，“老天爷”把治天下的圣德和使命交给他了。两千年后，叛徒、卖国贼林彪也捧出了“天命”的破招牌，学着孔老二的腔调，说什么“温文、豪放、理智”是“受于天”的，自比“天马”，要在天下“独往独来”。这充分说明，林彪和孔老二是一个庙里的反动喇嘛，念的都是一本反动、复辟经。

林彪和孔老二念的“天命”经，把人的命运说成是由“老天爷”安排的。孔老二的门徒就曾经说过，“死生有命，富贵在天”。那就是说，林彪和孔老二这些所谓“圣人”、“天马”，应该治理天下，主宰世界，享尽人间富贵，而我们劳动人民只能世代受奴役，受压迫，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这一切都是“老天爷”安排的，是谁也无法改变的命运。其实，这是地地道道的骗人鬼话。我们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贫下中牧只相信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不相信孔老二的天命论，也不相信林彪“受于天”的谣言和欺骗。

我是贫苦牧民的女儿。我们家在解放前，祖祖辈辈给王爷牧主当奴隶，受尽了剥削和压榨，尝尽了人间痛苦。可是，到我这一代，草原上升起红太阳，毛主席领导我们翻了身，一切全变了样。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担任了大队党支部书记，还作为光荣的工农兵学员进了大学。最近党组织和贫下中农、贫下中牧又要我担任旗委副书记的职务。这些在旧社会连作梦也想不到的事情，在今天却成了现实。按孔老二的说法，“老天爷”安排了劳动人民的命运，要我们世代做奴隶。既然如此，为什么今天我们的命运变好了呢？这是由于革命，而不是什么“天命”。同样，孔老二自称是“天降”的“圣人”，林彪也说自己是“受于天”的“天才”、“天马”，命定要做统治者。可是，孔老二不仅复辟没有搞成，而且落得象丧家的狗，



人人喊打的下场。林彪这个“天马”虽然逃到了天上，但只能“独往”而无法再“独来”，很快从天上掉下来，摔了个粉身碎骨，从“天马”变成了死马。林彪把自己一伙说得神乎其神，是什么“天马”“天才”“超天才”，为什么竟然遭到这样可耻的下场呢？就是因为他们是妄想阻碍历史前进的反动派，是同人民相敌对的。可见，没有什么命定的富贵和贫穷，也没有命定的统治者和奴隶，那个“主宰一切”的“老天爷”是根本不存在的。我们草原上的牧民都知道，头顶上的蓝天不会说话，也没有象人一样的意志，它根本不能决定人们的命运。孔子和林彪凭空捏造了一个“老天爷”，说它安排了人的命运，这完全是胡说八道，是唯心主义的荒唐理论。林彪妄图用这一套来对抗马克思主义，欺骗蒙蔽劳动人民，是绝对办不到的。

毛主席教导我们：“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我们人民群众能够掌握自己的命运，能够改天换地，能够砸烂旧世界，创造新世界。蒙古民族是祖国大家庭中的一员。旧社会，我们蒙族贫下中农、贫下中牧受尽了国内外反动派和王爷牧主的压迫，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孔老二和林彪说这是“天命”所定。我们这里的王爷牧主也是这样讲，他们把几十户贫苦牧民赶到荒滩上居住，起个名字叫“高黑艾力”，意思是“苦命村”。可是，我们在毛主席、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和各族革命人民一道，赶走了日本帝国主义，打倒了国民党反动派，推翻了王爷牧主的统治，走上了社会主义康庄大道。现在“苦命村”不苦了，贫下中农、贫下中牧团结起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生产一天天发展，生活一天好似一天。我们大队，解放前只有几百头牲畜，还大多是牧主的。解放后，不甘心失败的阶级敌人胡说，我们队缺水是“老天爷”安排的，谁也改变不了落后的面貌。可是我们却在党的领导下，斗垮了阶级敌人，开展了学大寨的群众运动，用双手修建了一座两千来平方米的水库，改变了缺水的面貌，使生产得到了发展。现在，我们有近两万头牲畜，购置了拖拉机、柴油机、抽水机、剪毛机、割草机和马车，有十几万元的公共积累。贫下中农、贫下中牧的家里摆上了半导体收音机、缝纫机，生活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幸福。这些变化是那儿来的呢？是“老天爷”给的吗？不是。是我们贫下中农、贫下中牧在党的领导下，与天斗，与地斗，与阶级敌人斗的结果。事实有力地驳斥了孔老二和林彪的谎言。不是“命由天定”，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



人民群众是自己命运的主人，是天下的主人。

孔老二的天命论是维护压迫，维护剥削，反对革命，压制反抗的反动理论，是剥削阶级统治人民的精神支柱，是反动派施行反动行为的理论基础。孔老二不是大讲什么“畏天命”吗？他就是妄图用天命论来欺骗和吓唬劳动人民和进步力量，拉历史倒退，使没落奴隶主的统治永远平安。他的这一套成了历代剥削阶级维护反动统治的法宝。过去草原上的王爷牧主，骑在我们贫苦牧民头上作威作福，把我们压榨到死亡的边缘。他们怕我们起来反抗，怕我们推翻他们的统治，也宣扬什么“天上有玉皇，地上有帝王，地下有阎王”。他们宣称自己是天生的王爷牧主，要我们劳动人民老实地听从他们的使唤，象绵羊一样温顺地服从他们的统治，谁要是起来造反，进行革命斗争，谁就会触犯“玉皇、帝王”，死了以后还要受“阎王”的惩罚。然而，我们没有听他们那一套，在毛主席、共产党的领导下，推翻了他们的统治，掌握了自己的命运。

林彪一伙抬出孔老二的僵尸，扛起天命论的黑旗，同那些被我们打倒的王爷牧主骑在一匹马上，哼的一个调调。林彪想干什么，难道还不清楚吗？草原上的狼要吃人，把自己打扮成猎狗模样。孔老二要“复礼”，林彪想复辟资本主义，都给自己披上“天命”的外衣。然而，狼总归是狼，总是逃不脱牧人的眼睛。林彪鼓吹天命论，把自己装扮成“受于天”的“天马”，他的目的，是妄图以此来欺骗和吓唬我们工农兵群众，要我们放弃革命，放弃斗争，解除武装，听凭他们这一小撮叛徒卖国贼称王称霸，复辟资本主义，实行法西斯统治，把历史拉向后退。林彪和草原上的王爷牧主是一丘之貉，是劳动人民不共戴天的仇敌。我们深深懂得，如果让他们的阴谋得逞，那些被打倒的王爷牧主和一切反动派就要重新上台，我们劳动人民就会重新落入苦难的火坑，吃二遍苦，受二茬罪。这是我们坚决不能容忍的。工农兵群众是历史的主人，天下是无产阶级和各族人民的天下，历史的车轮决不允许倒转。林彪的可耻下场，恰恰说明天命论救不了反动派的命。

我们同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天马”完蛋了，林彪这个卖国贼摔死了，天命论再一次破产了，但是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并没有结束。实践告诉我们，斗则进，不斗则退，不斗则垮，不斗则修。我们决心用战斗来保卫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让人民的天下永不变色。



污蔑劳动人民就是反对革命

天津铁路分局天津站六号门工人评论组

历代的反动派总是把他们自己打扮成救世主，把劳动人民骂成大傻瓜。没落奴隶主阶级的思想代表孔老二就吹他自己和奴隶主贵族是“上智”，把奴隶们说成为“下愚”。叛徒、卖国贼林彪搞的也是孔老二那一套，他自比“天马”，而恶毒污蔑我们工人、农民整天想的就是“油盐酱醋柴，妻子儿女”。这纯粹是胡说八道，是林彪敌视劳动人民的反动唯心史观的大暴露。

广大的劳动人民是进行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革命运动的主力军。谁否定工农群众，谁就是反对革命。怎样对待人民群众，是无产阶级革命家和资产阶级革命家的分水岭，是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斗争的一个焦点。毛主席和我们工农群众心连心，最信任我们，最看重我们。毛主席说：“**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这话大长了我们劳动人民的志气，给我们撑了腰。一想到这些话，我们心里就热呼呼的，浑身有使不完的劲，纵有再大的困难，再凶恶的敌人，也都不在话下。可是叛徒、卖国贼林彪，跟毛主席大唱反调，把我们工人农民污蔑为只知“油盐酱醋柴，妻子儿女”的庸人，这就充分证明他背叛了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劳动人民的死对头！

批判林彪的黑话，一定要具体分析它出笼的时代背景。林彪污蔑我们的这个话，是在日本鬼子侵略我国快要投降的时候说的。当时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抗日战争究竟是谁打的？胜利果实应该属于谁？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跟国民党反动派进行着十分尖锐的斗争。就是在这个节骨眼上，林彪别有用心地胡说什么工人农民想的不是抗日，而是“油盐酱醋柴，妻子儿女”。这不明明是要把人民群众用鲜血换来的胜利果实，双手送给蒋介石吗？谁都知道，在毛主席领导下，我国人民群众，在八年的浴血抗战中，想的、干的是早日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建设新中



国。多少人为了民族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生命，象革命样板戏《红灯记》里的英雄人物李玉和，就是优秀的代表。对这点，我们六号门老工人是深有体会的。那个时候的六号门，岗楼密布、狼狗成群，活象一座人间地狱，我们亲眼看到自己的阶级弟兄惨死在日寇刺刀之下，那真是满腔怒火，血海深仇啊！我们一心想的是报仇雪恨，赶走日本帝国主义。林彪却故意歪曲事实，跟蒋介石坐在一条板凳上，一个叫嚷日本是我打的，一个叫嚷打日本没有老百姓的份，老百姓整天想的都是“油盐酱醋柴”，那里懂得什么抗日。真是一个吹笛，一个按眼。林彪究竟在替谁说话，他代表的是那个阶级的利益，难道还不清楚吗！

毛主席说：“**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在抗日战争中，要不要发动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工人、农民，实行全面抗战，打人民战争，打持久战，这是抗日战争中的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根本分歧。抗日战争之所以取得胜利，就是因为毛主席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同蒋介石的投降卖国进行了坚决斗争，反对了党内机会主义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发动广大群众坚持八年艰苦抗战的结果。没有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没有广大人民群众不怕流血牺牲的英勇奋斗，中华民族的解放是不可能的。这是不容抹杀的历史事实。

历史是奴隶们创造的，这是历史的本来面目。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都证明了这是千真万确的真理。就拿六号门的今昔变化来说，解放前，封建大把头拿着“龙票”、“龙签”，张口说“这个地盘是我的”，闭口说“离了我，你们这帮穷鬼吃谁去”。明明是我们六号门工人养活着大把头，大把头硬说是他养活我们。三座大山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那真是天高没咱伸腰的权利，地大没咱立脚的地方。可是在他们统治的六十二年中，六号门照旧是一片开洼不见房，刮风不见人，下雨淌泥浆。解放了，我们斗倒了大把头，我们一心想的是革命。只二十五年，这里仓库、罩棚一大片，马路通道平展展。工人们驾驶龙门吊，开着叉车跑。货运量比解放前提高上百倍。就是那些曾经被封建把头根本不放在眼里的“臭苦力”，如今当了国家干部，登上了上层建筑的舞台，管理着国家大事。为什么能发生这样翻天覆地的变化？难道这是想“油盐酱醋柴”想出来的吗？是那个“圣人”恩赐的吗？当然不是。这一切都是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指引下，靠我们六号门工人的双手创造出来的。六号门的翻身史，是我们六号门工人群众在毛主席、共产党的领导下写出来的。我们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社会的发展要靠我们劳动人民来推动。历史已经证明，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民群众，有无穷的智慧和力量，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任何力量都阻挡不了我们的前进。“六亿神州尽舜尧”，毛主席这句话把我们劳动人民当家做主的心意都说出来了。而林彪却污蔑我们是什么只知道“油盐酱醋柴”的蠢货，这是多么鲜明的对比啊！

林彪恶毒污蔑我们工人农民的话，同孔老二鼓吹的“唯上智与下愚不移”的谬论完全是一路货色，都是反动的唯心论。毛主席说：“**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最聪明、最有才能的，是最有实践经验的战士**”。这是对孔老二、林彪最有力的批判。为什么卑贱者最聪明呢？就是因为他们是最有实践经验的战士。而反动的剥削阶级或代表剥削阶级利益的“高贵者”之所以最愚蠢，就是因为他们鄙视群众，脱离实践。大庆工人在那么艰苦的环境里，亲自参加了打井采油的战斗，获得了勘探准、钻井快、出油多的聪明才智；大寨的贫下中农亲自参加了改造七沟八梁一面坡的实践，获得了荒山变“江南”的聪明才智；我们六号门老工人跟装卸这个活打了几十年交道，摸到了装载长、方、圆、扁、轻、重、整、散等各种货物的脾气，获得了巧装满载的聪明才智。我们常说的实践出真知，斗争长才干，就是这个道理。孔老二、林彪根本反对认识来源于社会实践这个伟大真理，极力鼓吹“生而知之”的唯心论，根本同劳动群众、社会实践沾不上边，那儿来的聪明才智！孔老二不是自以为很有知识吗？其实，是一肚子秕糠。林彪自封为“超天才”，比谁都强，揭开一看，原来是一个不读书、不看报、不看文件，什么学问都没有的大党阀、大军阀。什么“天马”！不过是一只妄图阻挡历史车轮前进的螳螂罢了，这才是最蠢最蠢的了。

林彪不是一再叫喊他想的和劳动人民想的不是“一套”、“有天壤之别”吗？我们说，正是这样，这并没有什么奇怪。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同地主资产阶级，同叛徒、卖国贼林彪是水火不相容的，我们想的、说的、做的和他们想的、说的、做的当然有“天壤之别”，决不会是“一套”。我们想的是革命、前进；他们想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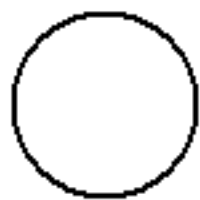
是复辟、倒退。我们想的是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添砖加瓦；他们想的是当皇帝，是重新骑在劳动人民头上。我们想的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建设社会主义，在将来实现共产主义；他们想的是搞阴谋诡计，把中国变成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殖民地。立脚点根本不一样，当然想不到一块儿去。

历代反动派都是鼓吹孔老二“上智下愚”那一套的，不管他们怎么说，说了多少，无非是要说明：压迫有理，反抗有罪。我们六号门老工人对这点最清楚。日本鬼子管我们叫“臭苦力”，国民党反动派管我们叫“臭装卸夫”，封建把头管我们叫“臭扛大个的”，都是妄想把我们整治成“饿死怨命苦，屈死不反抗”的顺民，服帖帖受他们统治。林彪所以污蔑我们劳动人民只知“油盐酱醋柴，妻子儿女”，也是打的这个鬼主意。他自吹是“天才”，他的脑袋天生“和别人的不一样，特别灵”，应该“指挥一切”、“调动一切”；劳动人民是“愚”，分不清鱼目和珍珠，就应该听他摆布。这样，他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推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建立封建法西斯世袭王朝，完成他“克己复礼”的“终身大事”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揭露地主资产阶级宣扬的唯心史观时说，他们的目的是要证明老百姓“应该由贵人、贤人和智者来统治”。这话揭了他们的底，捅到他们心窝上了。

凡是污蔑、整治劳动人民的人，决不会有好下场。毛主席指出：“**我们的敌人是落后的腐朽的反动派，他们是注定要灭亡的，他们不懂得客观世界的规律，他们用以想事的方法是主观主义的和形而上学的方法，因此他们的估计总是错误的**”。孔老二就是这样的反动派，被滚滚向前的历史潮流吞没了。日本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六号门的封建大把头，也是这样，他们在逞能一时之后，一个一个地倒下去了。我们劳动人民在毛主席、共产党的领导下，大步大步地前进了，想阻挡社会发展的反动派，却被历史抛进了垃圾堆。林彪这个反动家伙，自称“天马”，妄想在社会主义的天下“独往独来”，开历史倒车，最后落得个自取灭亡的下场。历史是人民群众的历史，谁跟老百姓作对，到头来只能是死路一条。



我们革命妇女最恨孔孟之道



大寨大队铁姑娘队

没落奴隶主阶级的思想代表孔老二和叛徒、卖国贼林彪，是一个黑窝里的两条毒蛇，都是我们劳动妇女的仇敌。

孔孟之道是吃人之道。两千多年来，历代反动统治阶级都用孔孟之道来维护他们对劳动人民的压迫和剥削。听了老一辈对旧社会、对孔孟之道的血泪斑斑的控诉，激起了我们心头的万丈怒火。在那黑暗的旧社会，广大劳动妇女最受压迫、最受鄙视，生活在人间地狱的最底层。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提起这四大绳索，提起孔孟之道，我们劳动妇女有多少仇恨要诉，有多少苦水要倒啊！我们常听老年人说：“旧社会，妇女不如一根草。”在我们这里过去流传着一句话，说什么“娶到的妻，买到的马，由我骑，由我打”。“三纲五常”那些吃人的“礼教”在旧社会不知坑害了我们多少妇女。解放后，在毛主席、共产党的领导下，砸烂了捆在妇女身上的四条封建绳索，广大劳动妇女的政治地位、经济地位和在家中的地位，都从根本上改变了。在三大革命运动中我们劳动妇女撑起了半边天，成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主人。就拿大寨来说吧，大队党支部九名委员中有三名女委员，二十七名党员中有十名女党员。团支部七名委员中有四名女委员，二十八名团员中有十一名女团员。林彪宣扬孔孟之道，妄图开历史的倒车，把“三纲五常”的绳索再重新套在我们劳动人民的脖子上，捆在我们劳动妇女身上，要我们再回到旧社会的人间地狱去，这是痴心妄想，是决不能得逞的。

孔老二为了维护剥削阶级的反动统治，为了维护剥削阶级男人对妇女的压迫、



欺侮。极力鼓吹鄙视妇女的反动谬论，宣扬男尊女卑，男主女从，胡说什么：“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林彪也在阴暗角落里，恶毒污蔑我们劳动妇女。两个坏蛋，一个腔调。

伟大领袖毛主席说：“**妇女占人口的半数，劳动妇女在经济上的地位和她们特别受压迫的状况，不但证明妇女对革命的迫切需要，而且是决定革命胜败的一个力量**”。毛主席这段话大长了我们劳动妇女的志气，是对孔老二、林彪污蔑妇女谬论的有力批判。无数事实证明这是千真万确的真理。我国广大劳动妇女在毛主席、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革命战争时期，积极参加各项革命工作，在前线，在后方，为革命事业做出了可贵的贡献，涌现出无数象刘胡兰这样的女英雄、女烈士。解放后，广大劳动妇女成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一支伟大力量，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我们大寨的女社员常年顶烈日，冒严寒，同男社员一道奋战在虎头山上，从整地到下种，从夏锄到收割，样样活儿都干得很好。姑娘们还同科学技术人员一道积极开展科学试验，试种的水稻亩产一千二百多斤，试种的棉花亩产皮棉八十斤。一九六三年，大寨遭受了一场百年不遇的特大洪灾，我们为了同特大洪灾作斗争，头顶烈日，脚踩烂泥，把几百亩冲倒的庄稼用自己的双手一根一根扶起来。在冰冻三尺的寒冬，为了修复被洪水冲坏的梯田，姑娘们提出了“天冷冷不了我们的**热心**，地冻冻不了我们的决心，寒风吹不倒我们的信心”的口号。姑娘们坚持同男社员一道战斗，从没有一个人叫苦叫累，铁姑娘队就这样在斗争中组织起来了，我们成了改造大自然的主人。十多年来，铁姑娘一茬又一茬地成长，现在一共有二十八名队员。其中有高中毕业的十七人。她们安心上农业“大学”，立志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铁的事实是对林彪、孔老二的谬论有力的回击。

孔孟之流胡说什么女子无才便是德。林彪也叫喊什么“忠孝节义”要“用其内容”。他宣扬这一套是妄想用反动的封建道德来腐蚀革命人民，束缚我们劳动妇女的手脚，要我们放弃阶级斗争，不要革命，服服帖帖去替地主资产阶级尽“孝”守“节”，以便他们复辟资本主义。我们大寨铁姑娘不买林彪和孔老二的帐，不受他们



的骗，不上他们的当，要造他们的反。长期以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以来，我们在大队党支部的领导下，积极参加革命大批判，敢造修正主义的反，敢造资产阶级的反，敢同违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各种错误倾向斗，越斗心越明，眼越亮。在同旧的传统观念斗争中，姑娘们和贫下中农一起，始终站在前列。由于孔老二的流毒，有的人看不起庄稼人，养女不嫁庄稼汉，我们大寨的姑娘就同这个旧观念作斗争。大寨的姑娘们热爱农村，安心农村，立志在农村干革命。多年来，大寨的姑娘不进城，不少人还出嫁到偏僻的山庄。我们经常登门上户宣传社会主义新风尚，揭露剥削阶级旧习惯。铁姑娘带头实行晚婚。办婚事，一条扁担两只筐，一套“毛选”带身上。不送“礼”，不受“礼”。村上死了人，不占棺材，不穿白，而是开追悼会。逢年过节，家家忆苦思甜，人人讲成长史。我们在破旧立新、移风易俗方面作出了些成绩。但是孔老二遗留下来的臭气毒气不会打扫一次、二次就干净了，破“四旧”也不能一劳永逸。复辟和反复辟的斗争经常在进行着。我们要经常批，深入批，反复斗。

叛徒、卖国贼林彪大肆贩卖孔老二那一套，是妄图复辟资本主义，让地、富反、坏、右、牛鬼蛇神一齐上台，使我们的国家退到旧社会去，让我们广大劳动人民和劳动妇女吃二遍苦，受二茬罪，叫我们姑娘们去过白毛女的生活。我们坚决不答应。在旧社会，大寨的天是地主富农的天，大寨的地是地主富农的地。那时候大寨有六、七十户人家，其中地、富四户，就这四户吸血鬼，把大寨贫下中农吸得无立脚之地，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当长工的多，背债欠帐的多，讨吃要饭的多，卖儿卖女的多，寻死上吊的多。光卖儿卖女的就有二十多户，还有七户被害得灭门绝了户。解放后，我们大寨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把旧大寨变成了新大寨，穷大寨变成了富大寨，人变、地变、产量变，农林牧副都有很大发展，家家有余粮，户户有存款。事实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在批林批孔斗争中，我们一定要认真看书学习，掌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武器，彻底把林彪贩卖的孔老二的破烂货扫进历史垃圾堆，决不让旧社会的悲剧重演。



放手发动群众 掌握政策界限

中国共产党上海第五钢铁厂委员会

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党中央发出了战斗号令，一场深入批林批孔的政治斗争，正在我们厂内迅猛展开。由于批林批孔反映了广大工人群众坚持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反对复辟资本主义、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成果的革命要求，运动一开头，就充分显示出工人阶级是批林批孔的主力军的巨大作用。“炼钢必须去磷去硫，革命就要批林批孔。”广大工人群众发扬一月革命风暴的精神，几天之内，贴出了一万多张革命大字报，召开了成百次大大小小的批判会。全厂工人口诛笔伐，斗争锋芒直指林彪、孔老二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群众发动之快，斗争热气之高，为近年来所少有。

我们在实践中体会到，要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必须放手发动群众批判修正主义，同时注意掌握政策界限，把运动不断地引向深入。

放手发动群众，深入批林批孔，必须狠批林彪“克己复礼”这条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紧密联系现实的阶级斗争、两条路线斗争的大是大非问题。这样，才能充分激发广大群众的革命斗志。我们厂批林批孔的战斗一打响，广大群众从林彪及其死党在短短两个多月时间里，就写了四条“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克己复礼”的条幅这件事中，更加清楚地看透了林彪这个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叛徒、卖国贼的真面目，进一步认清了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工人同志说，“复礼”就是复辟，孔老二要复辟奴隶制，林彪要复辟资本主义，真是“黑渣白渣都是渣滓，林彪孔老二是一个模子”。许多工人沉痛地回顾了旧社会受剥削受压迫的切身经历，控诉了刘少奇、林彪一伙推行修正主义路线的危害，



认识到如果让林彪“克己复礼”的阴谋得逞，那就是党变修，国变色，千百万劳动人民的头落地。工人同志愤怒地说：社会主义制度不容颠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容否定，历史不容开倒车。

在狠批“克己复礼”时，工人同志联系当前阶级斗争、两条路线斗争的实际，大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的伟大胜利，痛斥“今不如昔”的种种谬论。而这种“今不如昔”的谬论，在我们厂也有反映。第一电炉车间的工人群众，联系本厂、本车间的斗争实际，对照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后的变化，从办社会主义企业是坚持政治挂帅还是搞指标第一，加强企业管理是主要靠工人群众当家作主的自觉性还是靠规章制度“卡”群众，在发展生产技术上尊重群众首创精神、热情支持新生事物还是压制和束缚群众的积极性等几个方面，揭露了厂内、车间内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这种影响的主要表现：一是文化大革命中批判过的东西，有的又逐渐改头换面地出现了。例如，在质量管理上，文化大革命前，是靠少数专业管理人员卡群众，炉前质量检验员有一块“禁止出钢牌”，不管工人操作是否合理，只要他认为不对，就可用这张“王牌”禁止工人出钢，严重地挫伤了工人的积极性。文化大革命中，把这项不合理的制度冲了，建立了群众性的质量检查和专业人员检查相结合的质量检验制度，人人把关，加强了工人内部的团结，调动了工人群众的积极性。而现在，“禁止出钢牌”虽然没有了，但是，只靠专业人员检查，不相信群众的那种“我管，你干”的现象又露头了。二是文化大革命中涌现的新生事物，有的得不到支持。例如工人群众创造的“同炉渣洗”冶炼碳钢的新工艺，自力更生搞成的五吨真空精炼炉等等，由于存在一些缺陷，而受到冷遇。这些问题，实质上反映了在办企业路线上是巩固、发展还是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的大是大非问题，是前进和倒退的斗争。工人群众通过这样联系现实斗争，批判“克己复礼”，普遍受到了一次深刻的党的基本路线教育，更加认识到批林批孔对巩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成果的伟大意义，也进一步认识到在路线斗争中“斗则进，不斗则退”的真理，因此都以主人翁的精神，大胆揭露矛盾，解决矛盾，发挥了工人阶级的主力军作用，使批林批孔运动更广泛、



深入地发展。

放手发动群众，深入批林批孔，必须牢牢掌握批林批孔这个斗争的大方向，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随着批林批孔斗争的深入，广大群众在批判林彪反党集团恶毒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时，也联系到厂内有些人对待文化大革命的态度问题。例如，在有些车间里，工人群众对少数干部当中流行的所谓“三难”思想，即所谓“群众难弄，干部难当，工作难做”的思想，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这种“三难”思想，实质上是“今不如昔”的一种反映。还有些人，他们低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好形势，对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某些新生事物，看不惯，瞧不起，把社会上的某些资产阶级歪风邪气都算到文化大革命的帐上。这些都反映了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态度问题，从思想实质来说，都是一种复辟倒退思潮的反映。因此，当这些问题开始在干部和群众中揭开的时候，少数讲过一些错话的人，心情比较紧张。针对这种情况，我们作了研究，认为在深入批林批孔中，一方面要坚持斗争哲学，紧密联系本单位的阶级斗争、两条路线斗争的大是大非，把问题揭深揭透；同时又要紧紧掌握批林批孔这个中心，把斗争矛头对准林彪、孔老二，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特别是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坚决执行毛主席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对于具体问题作具体分析。要注意划清这样一些界限：是恶毒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盘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还是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某些问题一时想不通，讲了一些错话；是敌视、咒骂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还是因为受了旧的传统观念的影响，做了或说了一些不利于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成长发展的错事、错话。凡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都要按照毛主席教导的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处理，即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对于上面所说的某些错误思想，可以通过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进行讨论和辩论，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的教育，使广大干部和群众能够从讨论和辩论中分清路线是非，提高觉悟。这样，我们就能把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众，其中包括犯有这样或那样错误的同志团结起来，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组织起浩浩荡荡的



批林批孔大军，使批林批孔运动沿着正确的轨道胜利前进。

从我们厂的初步实践看来，只要这样做了，就能进一步发挥广大群众和干部批林批孔的革命积极性，取得较好的效果。例如，我厂第二中心试验室的工人、干部和技术人员，在批判林彪搞投降主义、卖国主义的罪行的时候，始终以批林批孔为中心，并且联系现实的斗争实际，批判了贪大求洋、洋奴哲学，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提高了路线斗争觉悟。他们一边批判林彪、孔老二，一边学习有关文件，同时联系实际，重新审查了两个工程的施工方案，提出“可增可不增的设备坚决不增；可用国产设备的坚决不进口；能够自己制造的设备坚决不向国家伸手”。经过发动群众初步讨论，削减了七台原来打算进口，价值几十万美元的设备，为国家节约了大量资金和外汇，进一步贯彻执行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

放手发动群众，深入批林批孔，要处理好革命和生产的关係，狠抓革命，猛促生产，保证群众运动的持续高涨。开始，少数同志有顾虑：这样一个大的运动，会不会影响生产？也有个别同志怕抓了生产，会不会重复文化大革命初期“抓生产，压革命”的错误。党委及时抓了这个问题，在干部和骨干中统一了思想。批林批孔，要开批判会，写大字报，学好马、列和毛主席的著作，搞调查研究，需要花一定时间。但是，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列宁说过：“**人民群众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够象在革命时期这样以新社会秩序的积极创造者的身分出现。**”我们厂的实践证明：工人群众在批林批孔斗争中焕发出来的革命积极性是难以估计的。他们一肩挑起了两副重担，豪迈地提出：既要当好批林批孔的主力军，又要做抓革命、促生产的闯将。运动开展以来，工人同志坚持在生产以外的时间闹革命。如果因为参加批判会，准备批判稿，部分同志需要占用生产时间，班组里留下的同志就自觉地把他们的任务担当起来，一个人完成两个、三个人以至更多的工作量，比平时干得更加出色。因此，每当厂里批林批孔斗争掀起高潮的时候，生产也往往会出现高潮。一月三十日，全厂召开批判大会，第一电炉车间抽出了三分之一的工人参加大会，可是，就在这一天，日产量比平时增加了百分之五十。从二月一日



到二十日，全厂电炉钢产量比去年同期增长了百分之十，钢材比去年同期增长百分之十以上，取得了革命、生产的双丰收。

放手发动群众，深入批林批孔，党委一定要敢于领导，站在运动的前头。原来，我们有些同志，以为实施具体领导，就是束缚群众的手脚，因而遇到问题不点头、不摇头，错误地认为这是接受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可以避免重犯路线错误。对此，我们在学习中，以毛主席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一系列指示为武器，回顾了文化大革命的经历，认识到我们有的同志之所以有这些错误思想，根本原因是对当前这场政治斗争还很不理解，没有真正领会毛主席、党中央有关指示的精神实质，而从思想上来说，还是怕群众、怕革命，是路线斗争觉悟不高的表现。当前，在批林批孔这场严重政治斗争中，是积极还是消极，是敢于领导还是不敢领导，是对每一个党组织有没有战斗力的严峻考验，也是对每个领导干部的考验。党委要真正成为带领广大群众开展批林批孔斗争的指挥部，就得教育干部“**要大胆指导运动，不要前怕龙，后怕虎**”。干部要走在前头，就得轻装。有些同志怕群众联系实际揭矛盾，问题摆了一大堆，难以解决，而不解决就会被动；有的同志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错误，领导运动就缩手缩脚。对于这些同志，我们着重帮助他们认识在当前这场斗争中，领导不应该把自己放在群众运动的对立面，应该坚决同群众站在一起战斗。群众揭矛盾，并不是要整几个干部，而是为了批林批孔，防修反修。干部有错误，就应当诚恳接受群众批评，自觉革命，改了就好。党委要及时地做好工作，帮助和鼓励他们纠正错误，积极投入批林批孔斗争。

我们厂的批林批孔运动正在深入。我们决心进一步认真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的著作，反复领会毛主席关于批林批孔的一系列指示和党中央规定的有关文件的精神实质，努力加深在这场重大政治斗争的认识，提高觉悟，坚定信心，依靠群众，大胆领导，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把批林批孔这件头等大事切实抓紧抓好。



联系路线斗争实际批林批孔

河北安平县南王庄大队党支部

我们南王庄大队的广大干部和群众，认真学习了毛主席、党中央关于批林批孔的重要指示，按照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迅速掀起了批林批孔的高潮。我们大队党支部加强了对这场运动的具体领导。同时，我们也充分发挥贫协、共青团、妇联会等组织的积极作用，并组织骨干串门串户，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思想发动。现在，全村的干部、党员、青年、妇女、学生和老人，都普遍发动起来了。广大群众怀着对林彪、孔老二的深仇大恨，到处摆起了战场，口诛笔伐，人人参战。大队、生产队已经召开批判会六十多次，在会上发言的有六百多人，办批判专栏十八处，写批判文章二百六十多篇。大家对林彪和孔老二妄图复辟的反革命罪行，愤怒地进行了声讨和批判，批林批孔的怒火越烧越旺。

批林批孔是一场革命与复辟、前进与倒退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虽然孔老二死了两千多年，林彪也完蛋了，但他们的流毒还没有肃清，因此，批林批孔必须充分发动群众，首先联系林彪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从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高度，把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批深批透，把孔孟之道批深批透。在批判中提高广大干部、群众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觉悟，永远走社会主义道路。这是使这场斗争深入下去、开花结果的一个重要问题。

林彪和孔老二是一类货。他们一个唱的“复礼”调，一个念的复辟“经”，都是要开历史的倒车。我们在批判“克己复礼”这个反动纲领时，回顾了南王庄农业合作化以来所经历的一场场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一九五四年，我们村三户贫农王玉坤、王小其、王小庞带头组织了一个合作社。可是在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影响下，有人千方百计地进行阻挠，硬要把他们这个社砍倒，逼着他们散摊子。三户贫农坚决顶住了这股复辟风，把社办下来了。他们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得到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高度赞扬，毛主席说：“这三户贫农所表示的方向，就是全国五亿农民的方向。”但是，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并没有结束，阶级敌人并没有死心，



一有机会就兴风作浪。在国民经济三年暂时困难时期，刘少奇一伙极力鼓吹“三自一包”的修正主义黑货，我们村一个没有改造好的富农分子就跳出来，叫嚷“牲口分户饲养”，鼓吹“单干”。贫下中农又坚决顶住了这股逆流，坚持了社会主义道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一小撮阶级敌人又跳出来捣乱，他们胡说三户贫农办社是“假的”，妄图否定三户贫农所坚持的社会主义方向，夺权变天。贫下中农纷纷起来，及时地戳穿并粉碎了他们的阴谋。林彪搞资本主义复辟，最适合一小撮地、富、反、坏、右的需要。如果他们上了台，就会把贫下中农重新推到苦水坑里，再吃二遍苦。在批判林彪“克己复礼”这个反动纲领时，大家回忆了解放前地主残酷压榨贫下中农的悲惨情景。那个时候，南王庄全村三百来户，欠地主债的就有二百一十户，要过饭的有一百二十四户，卖儿卖女的五十四户，给地主扛长活、打短工的三百八十多人。一些苦大仇深的贫下中农，用自己在旧社会血泪斑斑的家史，愤怒控诉和批判了林彪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

通过联系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实际，忆旧社会的苦，进行深入批判，对“克己复礼”的反动本质就看得更清楚了。贫下中农认识到，林彪搞“克己复礼”，就是要改变党的基本路线和政策，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一句话，就是要复辟倒退。广大贫下中农说：林彪妄想让我们走回头路，绝对办不到。我们要沿着毛主席指引的社会主义道路永远走下去。

要坚持“五亿农民的方向”，走社会主义道路，就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哲学，批判林彪、孔老二鼓吹的“中庸之道”，不断地同阶级敌人斗，同资本主义倾向斗。在批林批孔斗争中，我们联系了解放以来南王庄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实际，认识到所谓“中庸之道”，就是“转向之道”、“复辟之道”，斗则进，不斗则退。六队有个地主分子，平时装得象个猫似的，骨子里却时刻妄想变天复辟，一有机会就进行破坏。有一次在浇地时，他故意用铁锨砍伤牲口，使生产受到影响。群众当场抓住这件事，批判斗争了他。由于我们坚持了斗争，不断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使我们大队的革命和生产不断取得新成绩。在一片大好形势下，有的人头脑里阶级斗争观念淡薄了，认为敌人该斗的斗过多少次了，该批的批过多少回了，他们已经是“霜打的茄子——蔫了”，成不了什么“气候”了。可是阶级敌人并没有死心。在一次大搞农田基本建设时，还是那个地主分子，又跳出来，破坏农业学大寨。阶级敌人就是这样歹毒，他们是从来不讲“中庸”的。大家还联系资本主义倾向，批判了“中庸之道”。有一个队，以搞副业为名，违反国家规定，私自买了一部分油料，拿到大队油坊加工。党支部发现后，制止了这种错误作法，并组织干



部和群众讨论、批判。但有的人思想转不过弯来，认为没有必要拿到群众中去讨论，用不着批判。在这次批林批孔运动中，他们联系副业生产上的两条路线斗争进行分析，认识到：不顾国家计划，怎么赚钱就怎么干，就会走到资本主义邪路上去。他们表示，今后一定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和一切削弱集体经济的错误思想和错误倾向作斗争。

联系我们南王庄这一场场斗争，批判林彪、孔老二的“中庸之道”，大家受到了深刻教育，进一步认识到，如果不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哲学，大家都当“和事老”，我们国家就不会有今天，我们南王庄也不会有今天。贫下中农说得好：林彪一伙鼓吹“中庸之道”，就是不让我们搞阶级斗争，妄想捆住我们的手脚，让他们复辟资本主义。我们决不上他们的圈套。

在批林批孔斗争中，我们还联系农村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教育群众同一切剥削阶级的传统观念彻底决裂。例如，林彪曾经宣扬孔孟的“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的“天命”论，我们大队的阶级敌人就散布什么“命里只有八合米，走遍天下不满升”。在批判这种谬论时，贫下中农联系村里的阶级斗争实际，认识到“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的实质就是让人们俯首帖耳，听任林彪之流搞资本主义复辟。有一个老贫农用南王庄解放前后的变化批判了林彪、孔老二的谬论。他说：“解放前，咱南王庄是个旧河道、白沙滩、祖祖辈辈受熬煎的穷村子，地主老财说咱受罪是命里注定。可是解放后，天还是这个天，地还是这块地，在毛主席他老人家领导下，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靠咱这些泥腿子，平岗填沟，打井修田，把一个穷村子变成了棉过百、粮超千、树木成林果满园的社会主义新农村。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不是靠‘命’给的，而是靠革命得来的。”

随着批林批孔斗争的逐步深入，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精神面貌发生了显著的变化，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觉悟有了新的提高。贫下中农认真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成为批林批孔的主力军。关心国家大事，热爱集体，已成风气。知识青年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的决心越来越坚定。我们村现在有二十五岁以下初中、高中毕业生一百多人，经过批林批孔，都表示要扎根农村干一辈子革命。资产阶级的歪风邪气受到沉重打击，社会主义新思想进一步发扬。

毛主席说：“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我们贫下中农，一定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反林彪、孔老二之道而行之，坚持斗争，坚持革命，认真抓好批林批孔这个头等大事，永远沿着毛主席指引的社会主义方向大步前进。



反修斗争的强大思想武器

——学习《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

辛 风

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这部光辉著作，是适应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历史时代的需要，在反对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激烈搏斗中写成的。

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资本主义过渡到帝国主义阶段。帝国主义使资本主义一切矛盾极端尖锐化，无产阶级社会革命成为直接的实践问题。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加速了革命的到来。怎样对待帝国主义，怎样对待战争和革命的问题，在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以列宁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路线，同以伯恩斯坦、考茨基为代表的修正主义路线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列宁是反对第二国际修正主义斗争的最伟大的旗手。在这场斗争中，列宁写下了一系列捍卫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批判修正主义的重要文献，《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就是一部代表性的著作。列宁在这部著作中，分析了帝国主义的本质、特征和矛盾以及它同修正主义的联系，指出第二国际修正主义思潮的泛滥，绝不是偶然的现象，而是帝国主义时代的产物。垄断资产阶级为维持其反动统治，用从殖民地和附属国掠夺来的高额利润收买工人阶级的上层，造成了工人运动的分裂。列宁批判了考茨基为帝国主义辩护的反动谬论，彻底地揭露了他的社会帝国主义者的丑恶面目。这部著作，是指引全世界无产阶级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的战斗纲领。

列宁的著作，发表于半个世纪以前。半个世纪以来，国际形势已经发生了很大



的变化。但是，正如毛主席经常教导我们的那样，今天我们仍然处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没有过时。列宁在这部著作中，通过批判第二国际修正主义所作的理论概括，今天仍然是我们批判社会帝国主义、反对苏联现代修正主义的强大思想武器。

列宁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概括了大量的实际资料，对帝国主义作了科学的分析，指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特殊阶段。就是说，帝国主义是垄断的资本主义，是寄生的或腐朽的资本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前夜。列宁彻底批判了考茨基为帝国主义所下的**背叛马克思主义**的定义。按照考茨基的说法，帝国主义并不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阶段，而是金融资本“情愿采取”的一种政策。既然是“情愿采取”的政策，就可以这样，也可以那样。似乎经济上的垄断可以和非掠夺、非暴力的政策并存。列宁指出：“**考茨基把帝国主义的政治同它的经济割裂开了，把政治上的垄断制和经济上的垄断制割裂开了，来为他的鄙陋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即‘裁军’、‘超帝国主义’之类的谬论扫清道路。这种理论捏造的全部用意和目的，无非是要掩饰帝国主义的最深刻的矛盾，从而为同那些帝国主义辩护士即露骨的社会沙文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实行‘统一’的理论辩护。**”（《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分裂》）

帝国主义的经济实质是垄断资本主义。国内的垄断统治通过资本输出和扩张经济势力形成国际垄断，必然要推行霸权主义，直到通过战争来达到它们按照实力瓜分世界的目的。垄断统治一天不改变，帝国主义各国的根本政策是不会改变的。所以列宁说：“**同托拉斯和银行的政策‘作斗争’而不触动托拉斯和银行的经济基础，那就不过是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与和平主义，不过是一种善良而天真的愿望而已。**”列宁所阐述的这一帝国主义的经济基础决定它的政策的基本原理，不仅适用于资本帝国主义，也同样适用于社会帝国主义。

和资本帝国主义一样，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经济基础也是垄断资本主义。

在资本主义复辟以前，苏联工人阶级通过国家所有制的形式占有生产资料。国家所有制的性质，是国家政权的性质决定的。“**修正主义上台，也就是资产阶级**



上台。”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篡夺了苏联国家政权，疯狂地推行修正主义路线，使无产阶级专政变为大资产阶级专政，德国法西斯式的专政，希特勒式的专政。国家政权性质变了，从根本上说，国家所有制的性质也就变了。社会主义国有制已经变成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所有制，社会主义国营经济也变成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经济。

在苏联的国有企业里，工人阶级完全处于无权和被奴役的地位。企业经理有权“占有、使用和支配”企业所属财产，有权“出租”，“转让”和“出售”企业“闲置”的生产资料，可以自行“招收和解雇工人”，随意把工人踢出工厂大门。在那里，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和工人的关系，完全是剥削和被剥削、统治和被统治的关系。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横征暴敛，巧取豪夺，通过利润和税金等形式无偿地占有企业工人创造的大量财富，并通过高工资、高奖金和名目繁多的额外收入，贪婪地榨取劳动人民的血汗。一个普通工人的月工资只有六、七十卢布，而一个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分子的工资高达几千卢布，相差几十倍到一百倍。苏修的许多文艺作品中，都描写了这种无情地压迫剥削工人以养肥自己的所谓“当代英雄”。

苏联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和资本帝国主义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就其实质来说，并没有什么两样。所不同的，只是它是从社会主义国家所有制蜕变来的，集中程度更高，垄断性更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苏联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专政的基础；是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对外侵略扩张、推行霸权主义的经济根源。

苏修社会帝国主义为什么在“援助”和“友谊”的幌子下，向许多国家扩大资本输出和商品输出，攫取高额利润？为什么同美国帝国主义既争夺又勾结，妄想称霸世界？为什么声东击西，加紧争夺欧洲，争夺中东，并且加紧向地中海、印度洋以及一切可以伸手的地区扩张？为什么侵占捷克斯洛伐克，掠夺东欧国家，陈兵中国边境，在亚非许多国家进行颠覆活动？所有这一切，都是产生于社会帝国主义的经济本质。它的国外政策是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国内政策的继续。只要苏修垄断资产阶级的统治不变，社会帝国主义的经济本质不变，它的政策是不会改变的。必须从社会帝国主义的经济本质来观察苏修的政策。把经济基础和政策割裂



开来,就不可能认识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本质。毛主席指出:“我们说‘帝国主义是很凶恶的’,就是说它的本性是不能改变的,帝国主义分子决不肯放下屠刀,他们也决不能成佛,直至他们的灭亡。”(《丢掉幻想,准备斗争》)这个论断完全适用于苏修社会帝国主义。

垄断资本主义必然引起它的寄生和腐朽的趋势。列宁指出:“垄断制,寡头制,代替了自由趋向的统治趋向,极少数最富强的国家剥削愈来愈多的弱小国家,——这一切便产生了帝国主义的一些特点,使人必须说帝国主义是寄生的或腐朽的资本主义。”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考茨基胡说什么资本主义“比半个世纪以前具有更大的生命力”,这完全是给帝国主义涂脂抹粉。

帝国主义寄生性和腐朽性的重要表现之一,是人为地在某些方面阻碍科学技术的发展。在自由竞争占统治地位的阶段,资本家为了追求超额利润,必须采用新技术,否则就会在竞争中破产。在垄断占统治地位的阶段,资本家可以获得垄断利润,就在相当程度上失去了改进技术的动力,甚至要人为地阻止技术进步了。

列宁在谈到资本主义的腐朽趋势时还指出,资本主义的发展更不平衡,少数资本最雄厚的国家腐朽性表现得最为明显。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也是这种状况。美国就是一个腐朽性很突出的国家。美国经济一直依靠国民经济军事化来支撑,军火生产在各个经济部门所占的比重日益增长,民用工业落后。工业增长速度和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都低于日本、西德等资本主义国家。战后已经多次爆发危机,美元一再贬值。连美国统治集团也不得不哀叹今非昔比,美国的地位大大下降了。另一个超级大国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情况同样不妙。它为了同美帝争夺世界霸权,也日益加紧推行国民经济军事化,使大量人力、物力、财力投到军火生产上。苏修公布的军事费用数字同实际数字距离很大。据估计,一九七二年,苏修的实际军事费用,约占国家预算支出的三分之一。苏修的国民生产总值大约为美国的一半左右,而它的军费却与美国相差无几。军事开支的庞大,军事工业的恶性膨胀,造成民用工业、尤其是消费品工业落后,农业长期停滞。现在,苏修的工业



总产值增长率不断下降。市场供应紧张，粮食不足，商品奇缺，物价高昂。财政状况不断恶化，内债外债与日俱增。为了应付国内经济一团糟的局面，苏修极力向资本主义国家乞求贷款，拍卖资源，但是，这不过是饮鸩止渴，只能使矛盾更加尖锐化。

两个超级大国表面上神气十足，架子很大，到处伸手，用各种手段互相争夺，内部却矛盾重重，虚弱得很，经不起风吹草动。一个捷克斯洛伐克事件，就把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弄得原形毕露。一个“石油武器”，就把美帝国主义搞得惶惶不可终日了。

帝国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就是说，这种制度把资本主义的各种矛盾发展到极点，接着就是革命的开始。列宁尖锐地批判了臭名昭彰的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的谬论。指出考茨基宣扬什么“新的超帝国主义的政策，将以实行国际联合的金融资本共同剥削世界，来代替各国金融资本的相互斗争”，从而可以停止战争，废除军备，实现世界的持久和平，是“**掩饰帝国主义矛盾的深刻性和帝国主义产生革命危机的必然性**”。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在它和社会主义之间，根本不可能再出现什么“超帝国主义”阶段了，帝国主义的崩溃，就是社会主义的胜利。帝国主义阶段，金融资本的统治不是削弱而是加强了世界经济各个部分在发展速度上的差异。既然实力对比发生了变化，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除了用武力来解决矛盾，就没有别的出路。“所以，资本主义现实中的（而不是英国牧师或德国‘马克思主义者’考茨基的庸俗的市侩幻想中的）‘国际帝国主义的’或‘超帝国主义的’联盟，不管形式如何，不管是一个帝国主义联盟去反对另一个帝国主义联盟，还是一切帝国主义强国结成一个总联盟，都不可避免地只会是前后两次战争之间的‘暂时休战’。”帝国主义国家之间按照实力，在某一个时候，在某些问题上，表面上达成一些协议，也只是为了暂时承认现状，以便准备力量在下一回合中进行更大的争夺。一旦实力对比发生变化，任何“协议”都会统统变成废纸。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这样的事情见得还少吗？

今天，世界上主要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争霸。这两个武装到牙齿的帝国主义



国家，既争夺又勾结，勾结是为了更进一步争夺。苏修叛徒集团宣扬什么“军事缓和”、“政治缓和”，完全是为了欺骗世界人民，为它的霸权主义打掩护。苏修叛徒集团宣扬什么“持久和平”，是重新搬出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的谬论，掩盖自己的侵略目的和叛徒嘴脸，阻碍国内人民和世界人民起来革命。正如列宁当年批判考茨基时一针见血地指出过的：“是前进，使帝国主义所产生的种种矛盾更加尖锐、更加剧烈呢，还是后退，去缓和这些矛盾呢，——**这些问题是对帝国主义的批评中的根本问题。**”苏修叛徒们也说什么要“缓和”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引起的种种矛盾，但“天下大乱”的事实却每天都在无情地揭穿这种修正主义的谎言。他们天天喊“缓和”，实际上无论在欧洲，在中东，在印度洋，都处于剑拔弩张之势。现在美苏争夺的重点在欧洲。什么欧安会，中欧裁军会，都是空话，目的是向欧洲人民散布和平幻想。这一点，欧洲也有许多人越来越了解了。苏修美帝天天喊裁军，实际上天天在扩军。苏美两家的所谓“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已经谈了四年多，越谈，双方的核武器越多。最近，就在二月十九日第二阶段会议复会这一天，苏修竟再次向太平洋水域发射能携带分导式多弹头的新型洲际导弹，以表示其核裁军的“诚意”。真是绝妙的讽刺！

当前国际形势的特点是天下大乱，“山雨欲来风满楼”。苏美两个超级大国争夺世界霸权愈演愈烈，把整个世界闹得很不安宁，大大加剧了当代世界的各种基本矛盾。这对革命人民来说，是好事不是坏事。它唤醒和锻炼了人民，特别是加强了第三世界的团结。人民，只有人民，才是主宰世界命运的决定力量。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正在衰败没落。“**苏修、美帝狼狈为奸，做了这么多的坏事、丑事，全世界革命人民是不会饶过他们的。世界各国人民正在起来。一个反对美帝、苏修的历史新时期已经开始。**”“无可奈何花落去”。帝国主义横行霸道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二十世纪初期，列宁同以伯恩斯坦、考茨基为代表的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斗争，是俄国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前奏。今天，我们同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是国际范围内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长期斗争的继续。列宁非常确切地把考



茨基称之为“**口头上的社会主义实际上的帝国主义**”，即社会帝国主义者。就是说，考茨基虽然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打着社会主义旗号，实际上是帝国主义的走狗，是帝国主义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的辩护士。苏修叛徒集团作为社会帝国主义者，和考茨基在阶级本质上是相同的。但是，也有不同之处。它已经篡夺了国家政权，运用整个国家机器实行帝国主义政策。苏修叛徒集团不仅宣扬修正主义谬论，而且利用从其他国家攫取的高额利润，收买许多国家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工人贵族（不管是已经掌握政权的还是没有掌握政权的），在全世界推行一条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路线。为了维护它的社会帝国主义的利益，实现它侵略和扩张的野心，苏修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对于别的国家，除了用武力占领、干涉之外，还千方百计从内部进行颠覆。在这方面，全世界人民需要保持高度警惕。一切先进的人们，一切马克思主义者，有义务在全世界人民面前，彻底揭露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反动本质，并同它所推行的修正主义路线进行坚决的斗争。

只要世界上还存在着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我国的修正主义分子和反革命分子的活动，总是同国际上的反动派互相呼应的。林彪这个“超级间谍”，就是妄图投靠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叛徒、卖国贼。他妄想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把我国变成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殖民地。林彪攻击我们批判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做绝了”，正表明他们是一伙，正表明我们的战斗的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打中了这伙叛徒的要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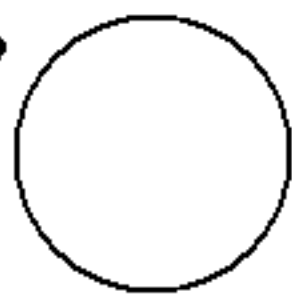
列宁指出：“**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如果不同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密切联系起来，就是一句骗人的空话。**”为了防止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侵略和颠覆，我们要按照毛主席“**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指示，提高警惕，加强战备。同时，必须在政治上思想上同修正主义作针锋相对的斗争。在当前，就是要通过批林批孔，深入批判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肃清刘少奇、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余毒。认真阅读《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可以从中学习列宁怎样把反帝反修密切结合起来的斗争经验，掌握反修斗争的锐利武器，把当前批林批孔斗争搞得更加深入，把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



锄毒草 化肥料

到底是谁家的“工具”？

——评安东尼奥尼的“申辩”



华 言

一年多以前，安东尼奥尼提着他那便于进行偷拍的“超八毫米摄影机”，极为得意地离开了他所敌视的中国。这个自称为“天生的悲观主义者”的导演，此时此刻倒并不“悲观”，他为这次在中国钻了一次空子——以特务手段拍摄了反华影片而沾沾自喜：拿这部反华影片作为投靠新主子的“礼物”，岂不可以改变自己很久以来“怀才不遇”的处境？然而，安东尼奥尼毕竟高兴得太早了。这部题为《中国》的反华影片，现在正受到中国人民义正辞严的批判。许多国家的人民，包括意大利人民和许多友好人士在内，也都纷纷谴责他的无耻的反华行径。

于是，安东尼奥尼慌了手脚，急忙跳出来“申辩”道：“凭良心，我没有作过这样事，我不承认污蔑中国和歪曲中国现实的指责。”安东尼奥尼的“良心”，就是帝国主义强盗和骗子的“良心”。一百多年来，帝国主义正是“凭”着这种“良心”，疯狂侵略和瓜分中国。社会主义新中国诞生以后，他们又“凭”着这种“良心”，恶毒地“污蔑中国和歪曲中国现实”。中国人民对这种“良心”实在是领教得够多了，早就看透了。而安东尼奥尼居然还象宣布真理似地宣布这样的“良心”是洁白无瑕的，这能骗得了谁呢？看来，他似乎至今仍在迷信法西斯头子的那句“名言”：谎言重复多次就会变成真理。所以他在“申辩”中，不只是竭力洗刷自己的罪行，甚至还倒打一耙，说中国人民批判他这部反华影片是把他当作了“一场兴起的政治争论



的适时的工具”。

这可不得了。堂堂一个名导演，怎么忽然成了一种“适时的工具”呢？其实，只要把安东尼奥尼的“良心”放在阶级斗争中去考察，就可以知道他自称“工具”的说法，正暴露出他自己的真实嘴脸。他的确是一种“工具”，但不是什么中国人民把他当作了“政治争论”的“工具”，恰恰相反，是他甘心情愿地充当了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敌人的“工具”。

何以见得安东尼奥尼是充当了这样的“工具”呢？这应该从他所谓的“政治争论”谈起。谁都知道，我国国内存在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国外存在着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的颠覆和侵略的威胁。就在苏修叛徒集团的“超级间谍”林彪垮台以后，我国人民正在深入进行批林整风的时候，安东尼奥尼于一九七二年五月中旬闯进了中国。他从自己漆黑的“良心”出发，采用种种卑劣的电影手法，把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中国拍得一团漆黑。他通过一系列肆意歪曲的画面和用心险恶的解说，妄图证明过去作为帝国主义冒险家“乐园”的旧中国，比现在劳动人民当家做主的新中国要“繁荣”得多。这种“今不如昔”的论调，同林彪反党集团污蔑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妄想“克己复礼”的反革命叫嚣，多么相似！安东尼奥尼来华以前，曾向西方记者表白：“我此行不带脚本”。其实，他的“脚本”早就有了，林彪和他的后台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攻击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那些内容，不就是他现成的“脚本”吗？林彪“克己复礼”不成功，“天马”跌下来变成了死马。要说这个打击对苏修有多么大，那就甭提啦！安东尼奥尼当然也不愿意看到由于林彪的垮台而在中国断了“复礼”的烟火。所以，在这“一场”兴起的政治争论”的时刻，他才把苏修污蔑中国的那一套反华滥调再现于银幕上。这究竟是适应了谁的需要，充当了谁的“工具”，岂不是一清二楚的吗？

有趣的是，在问题揭开之后，有个西方记者偏要刨根追底，去问安东尼奥尼究竟是不是“俄国的应声虫”。安东尼奥尼“耸了耸肩膀”，表示“不打算说得稍明确点”。他很难为情地说：“这只是表面，……是吗？”要这位导演公开承认自己是“应声虫”，未免使他太下不了台阶。但是，安东尼奥尼为了顾全面子，居然把“应声虫”说成只是“表面”的现象，这就欠妥了。既然这位先生惊慌失措到了



语无伦次的地步，那也不必太使他为难了。关于这个“应声虫”是否同苏修的反华声音配合得“适时”的问题，还是让事实来“说得稍明确点”吧——

在一九七一年底到一九七二年初之间，苏修开动它的宣传机器，拼命攻击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大地阻碍了”生产的发展，“经济处于停顿状态”。于是，安东尼奥尼来到我国以后，不反映我国“抓革命，促生产”的真实景象，却在反华影片中硬污蔑说“文化革命打乱了生产系统”。请问，安东尼奥尼先生，这不就表明你这个“应声虫”“应”的完全是同一个调子吗？

还是在一九七二年初，苏修污蔑我国人民“不自由”，甚至胡说革命“使儿童丧失人的感情”。所以，安东尼奥尼对中国人民当家做主、意气风发的精神面貌视而不见，见而不拍，却在其反华影片中恶意暗示中国人民受压抑，污蔑中国儿童歌颂毛主席、共产党的“政治性”歌曲和他们“如此可爱”的年龄不相协调。请问，这不就表明你这个“应声虫”的“良心”是完全和苏修心心相印的吗？

也是在安东尼奥尼来华之前不久，苏修诽谤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破坏的历史文物不计其数”。安东尼奥尼为了替苏修这一诽谤作印证，在反华影片中胡说什么我国有的城市现在“遗留下来的完整无缺的古迹已寥寥无几”。安东尼奥尼宣称这次来中国拍片“是寻找形象的，而不是寻找判断”。其实他的“判断”本来就不用“寻找”，事先就是以新沙皇的反革命“判断”为判断的。既是如此，他怎么会“寻找”中国人民的革命形象？他又怎么会反映出我国“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的真实情况？又怎么可能把我们文艺舞台上英姿飒爽的工农兵英雄形象当作他拍摄的“形象”呢？

又是一九七二年初，苏修叛徒集团七拼八凑地拍摄了一部大肆污蔑我国的电视纪录片。此片毫不掩饰地说：希望中国“重新回到真正的社会主义”，即希望修正主义在中国上台，复辟资本主义，使中国“重新”变成黑暗世界。于是，安东尼奥尼在拍完同一主题的反华影片回到罗马以后，特地举行了一个记者招待会，用一种算命先生的腔调介绍自己的体会说：“更大的可能是中国将会被污染，而不是我们被净化。”这里所谓的“污染”与“净化”，显然是双关语。就是说，中国“更大的可能”是被资本主义改造过去，而不是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这句话毫不



新鲜，它是当年杜勒斯的预言，也是今天新沙皇的心愿。然而，杜勒斯看不到这一预言的实现就去见他的上帝了；新沙皇也没有看到自己的心愿变成现实，却偏偏目睹了刘少奇、林彪相继完蛋！心愿未遂就成了心病。怎么治好这种心病呢？最好的药方就是攻击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谁如果能把中国经过文化大革命后的现状说得越糟糕，那么他医治这种心病的疗效就越灵光。在这个意义上说，苏修拍的反华电视片的确不如安东尼奥尼的《中国》疗效大。这是因为：前者是苏修自己关门炮制的，人家一看就不可信，而后者是打着“公正”、“客观”的幌子，钻到中国来拍摄的。安东尼奥尼早已意识到这一点。他的所谓“更大的可能”云云，与其说是讲给罗马记者们听的，倒不如说是讲给莫斯科新沙皇听的。他的潜台词是说：陛下请放心吧，我这个“工具”所拍的这部片子正在为实现您的心愿服务呢！

果然，安东尼奥尼的反华影片一出笼，新沙皇看了之后真象吃了补药一样心花怒放。当中国人民起来反击的时候，苏修赶忙纠集它国内外的宣传工具，拼命给安东尼奥尼撑腰打气。例如一家苏修报纸竭力吹捧“他是一位大艺术家，举世闻名的电影导演”，“过去没有任何人曾经这样想过”他是一个“反动分子”。它还公然说安东尼奥尼对中国现实的无耻歪曲不算是“污蔑”。苏修这样露骨地为这个“工具”鸣冤叫屈，显然是想挽回他的失败，以便通过这部反动影片掀起一股反华恶浪。但是，苏修叛徒集团在匆忙之中却忘记了两点：第一，时代前进了，在世界人民的觉悟日益提高的今天，谁想反华就只能孤立他自己；第二，安东尼奥尼过去所以能比苏修其他的间谍起更大的作用，就在于他还披着一件“自由”的艺术家外衣，如今你们拼命庇护他，岂不是正好暴露了这个所谓“举世闻名的电影导演”和你们之间存在着一种不可告人的肮脏关系吗？

安东尼奥尼投靠苏修并不是偶然的。此人为反动派效劳，远不自今日始。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正当全世界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风起云涌的时候，他一头栽进了法西斯主义的怀抱，开始了忠实地为墨索里尼法西斯统治卖命的反动生涯。这时他拍摄的纪录影片中，把劳动人民拍成愚昧无知的“可怜虫”，充分发挥了他作为法西斯“工具”的反革命作用。一九四二年，他根据意大利法西斯宣传机关“政



治片与战争片摄制处”的命令，为了给沾满人民鲜血的法西斯军队树碑立传而编了电影剧本《一个航空员的归来》，肉麻地吹嘘法西斯空军如何“英勇善战”，如何“忠于法西斯意大利”。这样一个老牌法西斯分子，在意大利革命人民中间早已是臭不可闻了，而在苏修的心目中他不但不“反动”，还香得很呢，这就充分说明他们沆瀣一气，臭味相投。明于此，人们对这个“工具”如此“适时”地拍摄反华电影，苏修又如此“适时”地给他喝彩，就不会感到奇怪了。

现在，安东尼奥尼的“良心”已经昭然若揭了。对这位先生的政治面貌，如果要“一言以蔽之”的话，借用他在这部反华影片中污蔑中国人民的那句“既想念过去，又忠于现在”，真是最恰当不过的了。他是“既想念过去”的希特勒、墨索里尼，“又忠于现在”的勃列日涅夫之流。在十八世纪意大利，有一出著名喜剧，叫做《一仆二主》，写的是一个自称“口齿伶俐，能随机应变”的小丑，在伺候两个主人的过程中如何从中渔利。在二十世纪意大利，安东尼奥尼用自己的反动言行，自编自导自演了另一出“一仆二主”。但这出戏并不是喜剧，剧里的小丑随着他的老主子被反法西斯战争打得家破人亡，就成了一条丧家的乏走狗，这便是他“天生的悲观主义”的来由。但后来他在“悲观”中总算得到了一点欣慰，从苏修统治者勃列日涅夫之流的身上看到了法西斯主义并没有绝种，他就摇尾乞怜找到了新主子。这个小丑虽然也“能随机应变”，但决不能改变自己失败的命运。安东尼奥尼的“一仆二主”，上半场戏以其老主子的灭亡而落幕，下半场戏尚未结束，但它的结局则可以在此预告：他和新主子的拙劣表演也只能是“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

末了，还要提一笔的是，盘踞在我国领土台湾省的蒋介石集团，最近也拚命在为安东尼奥尼大吹特吹。他们简直象吹肥皂泡似的，把这个被世界人民嗤之以鼻的反华小丑吹成了“一位世纪性的大人物”。牛皮吹得如此之“大”，倒恰恰成了“世纪性的”笑话。但这也不足为怪，蒋介石集团早就陷于风雨飘摇、朝不保夕的绝境，整天用叫喊“处变不惊”来掩饰极度惊慌的心理，现在忽然发现了这根稻草，怎能不赶快抓住呢？可惜稻草毕竟只是稻草，无论怎样吹嘘它的反动作用，它也救不了蒋介石的命。妄图依靠这个苏修的“工具”来打强心针，继续作垂死挣扎，与全国人民为敌，只能使自己灭亡得更快。



评晋剧《三上桃峰》

初 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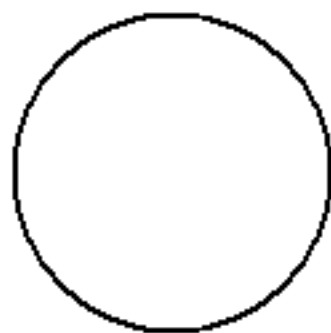
当前，文艺战线的形势同各条战线一样，一派大好，欣欣向荣。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路线的指引下，在革命样板戏带动下，群众性的革命文艺创作运动蓬勃兴起，好的和比较好的作品越来越多，受到了广大工农兵群众的热情鼓励和欢迎。最近，在北京举行的华北地区文艺调演，反映了社会主义文艺事业迅猛发展的趋势，体现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文艺战线取得的新胜利。但是，文艺战线从来不是风平浪静的。文艺，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总是敏锐地反映着社会上的政治斗争。在大好形势下，冒出个把毒草，这也是不足为怪的。

由山西省文化局创作组集体创作的晋剧《三上桃峰》，就是一株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叛徒刘少奇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翻案的大毒草！

《三上桃峰》的故事情节并不复杂，说的是某公社杏岭大队，以欺骗手段把一匹病马当作好马卖给了桃峰大队。杏岭大队党支部书记发现此事，亲自三上桃峰，退款道歉。

该剧的炮制者和鼓吹者声称：“一滴水可以见太阳嘛！”“《三上桃峰》就是要通过小题材表现大主题”。好吧！让我们来看看《三上桃峰》的“大主题”究竟是什么？

—



《三上桃峰》的出笼，是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在文艺上的反映。

在我党的历史上，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同刘少奇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进行了长期的激烈斗争。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主席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伟大号召，提出了“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战斗任务。一九六三年五月，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十条），在广大农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其后不久，刘少奇抛出了一条形“左”实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镇压人民群众，保护牛鬼蛇神。刘



少奇指派他的老婆王光美窜到河北省抚宁县的桃园大队，以“四清”为名，行复辟之实，炮制了一个旨在对抗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桃园经验”。王光美狂妄地说：“全国都在学大寨，桃园要在政治上超过大寨，叫全国也要学习桃园。”妄图用桃园对抗大寨，用刘少奇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取代毛主席的正确路线。一九六五年一月，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批判了刘少奇的反动路线以及“桃园经验”，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引向深入。

但是，刘少奇一伙贼心不死，负隅顽抗。王光美不得不从桃园撤退以后，还留下一个“巩固组”，送去一匹大红马，死守桃园这块阵地。他们不仅在桃园附近立起了一块高达丈余的石碑，上刻“永不忘记”四个大字，为她树碑立传，王光美还亲自跑到旧文联礼堂作报告，策动文艺界运用文艺形式来为她树碑立传，歌功颂德。

就在这样的历史政治背景下，一九六五年夏天开始，在被旧中宣部这个阎王殿控制的舆论阵地上，围绕着通讯《一匹马》和故事《三下桑园赎马记》，掀起了一股宣传热潮。主持宣传的人特意提醒说：这个“故事发生在经过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地方——河北唐山地区抚宁县，更加引起人们深思。”“深思”什么？就是要人们看清楚这个故事是为王光美涂脂抹粉的，是为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他导演的“桃园经验”翻案的。

在这场阶级斗争中，以周扬为首的“四条汉子”及其同伙，倾巢而出，喧嚣一时。在当时被反革命的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统治的文艺界，以《一匹马》的故事为题材的报告文学、连环画、纪录影片和各种样式的戏剧、曲艺，纷纷出笼。旧中宣部的一个副部长，指令在北京的某一话剧院赶排同一题材的《春风杨柳》，叫嚷“要搞出样板，起示范作用”。旧文化部的一个副部长，计划亲自带领一个文化工作队去抚宁县，把王光美蹲点的这个地方搞成群众文化活动的“样板”。

紧步周扬之流的后尘，一九六六年一月，山西省的《火花》戏剧专刊，以卷首的显赫位置，发表了根据上述通讯改编的大型晋剧《三下桃园》。请同志们注意：通讯中的真实地名是“桑园”，剧本却偏偏改为“桃园”。一字之易，点在题上，更为醒目。剧中大唱什么“社社队队全一样，唯有桃园大不同”，用反动的“桃园精神”，对抗毛主席发出的“农业学大寨”的伟大号召！他们唯恐观众看不清楚这个戏的政治意图，还煞费苦心设计了原通讯中没有的人物——一个姓王的女县长，让她从幕后走到前台，颐指气使，招摇过市，用她之口点破这个剧本的主题



在于歌颂桃园“社教运动的胜利果”。这是在文艺舞台上为刘少奇、王光美树起的又一块“碑”。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三下桃园》受到了革命群众的批判，这块“碑”被推倒了，打碎了。事隔八年，在某些人的指使和鼓励下，《三下桃园》改名为《三上桃峰》，又被重新搬上舞台，把这块被推倒了、打碎了的“碑”又树了起来。这是多么触目惊心的阶级斗争啊！从《三下桃园》到《三上桃峰》，中心事件没有变，故事情节没有变，基本的人物关系也没有变。惹人注意的三处改动是：一、“桃园”变为“桃峰”；二、时代背景从“四清”运动后的一九六五年推到了一九五九年；三、那个姓王的女县长不见了。然而，越描越黑，欲盖弥彰。这些改动，除去说明炮制者完全知道一匹马的故事的政治背景，完全知道《三下桃园》的政治要害，作贼心虚，害怕马脚太露以外，丝毫不能说明别的。

人们不禁要问《三上桃峰》的炮制者和支持者：既然明明知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批判了《三下桃园》，明明知道这个毒草剧本的要害所在，为什么现在又为它改头换面，乔装打扮，迫不及待地搬上舞台？

《三上桃峰》的炮制者曾经说过：“要不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个戏早就红了！”一语泄露了天机：他们这个戏跟刘少奇是同命相连的。“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刘少奇垮台了，他们如丧考妣，于心不甘。经过几年的炮制，他们认为时机成熟了，就明目张胆地把《三上桃峰》抛了出来，大喊大叫什么“《三上桃峰》是山西的代表性剧目！”“《三上桃峰》是经过七年锤炼的。别的戏不上，行；《三上桃峰》不上，不行！”当演员表示不愿排练这个戏时，他们竟威胁说：“是毒草也要演”，不演就“以破坏革命现代戏论处”。看，他们要用这个戏来为刘少奇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翻案的气焰何等嚣张！可是，当革命群众揪住了他们的狐狸尾巴之后，他们又装出一副可怜相，说什么“没有看过原来的报道”呀，“不知道这个故事有什么政治背景”呀，等等。躲躲闪闪，支支吾吾。事实胜于雄辩。白纸黑字，铁证如山，《三上桃峰》是经过精心炮制，有人批准，有人支持抛出来的。《三上桃峰》为刘少奇翻案的事实，是任何人都抵赖不掉的！

二

从《三上桃峰》的政治背景看，是为刘少奇翻案的。从《三上桃峰》所表现的政治内容看，也是为刘少奇翻案的，是为刘少奇、林彪他们所推行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翻案的。



第一，《三上桃峰》的炮制者，竭力鼓吹刘少奇、林彪的“阶级斗争熄灭论”，反对党的基本路线。

党的基本路线告诉我们：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存在着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进行颠覆和侵略的威胁。《三上桃峰》却千方百计地掩盖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大搞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合二而一”。对农村资本主义势力的代表人物老六，杏岭的贫下中农和党员不反击，不斗争。剧中还将老六美化为想为集体“办好事”的人。对农村资本主义势力在党内的代理人、杏岭大队的大队长李永光，不仅不去表现党员、群众对他的斗争，反而为他开脱罪责，把他的错误性质说成是什么“本位主义思想”，还为他评功摆好，故意回避这场尖锐激烈的路线斗争。

在这个戏里，没有阶级矛盾，没有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你好我好，大家都好，可真是个人人“忠恕”、个个“礼让”的“君子国”呵！当年大刮吹捧“桃园经验”的妖风时，报纸上不是有人通过讲述小说《镜花缘》里“君子国”的故事，号召人们在创作中表现现实生活中的“君子国”吗？《三上桃峰》的炮制者果然把一个“君子国”搬上了舞台。这个“君子国”不是别的，就是刘少奇、王光美在桃园已经建立过的地、富、反、坏、右重新上台，劳动人民重新受压迫的资产阶级专政的王国！

第二，《三上桃峰》的炮制者，狂热地宣扬刘少奇、林彪所贩卖的“孔孟之道”，把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冒充为共产主义风格和无产阶级思想。

风格是观念形态，是客观实践的产物。在阶级社会中，风格是有阶级性的。《三上桃峰》所宣扬的这种不讲阶级、不讲路线、互相“礼让”的“风格”，根本不是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而是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两千多年前，反动奴隶主阶级的代言人孔丘之流鼓噪什么“忠恕”、“克己”，什么“礼之用，和为贵”，目的是“复礼”。刘少奇、林彪继承了孔老二的衣钵，也大讲什么“以德报怨”、“忍辱负重”，什么“两斗皆仇，两和皆友”，目的是复辟。《三上桃峰》所宣扬的“风格”，就是这种主张倒退、反衬革命的孔孟之道，是束缚革命人民斗争意志的精神枷锁。剧中的“风格”体现者、主要人物青兰，就是奉行孔孟之道的典型人物。她在全剧中的行动，就是往来奔波于杏岭、桃峰之间，忙于补过失、堵窟窿。这是个只抓小事不抓大事、只顾“马情”不顾敌情的政治庸人。炮制者把这样一个依照黑《修养》的



规格铸造出来的人物，冒充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赋予她一个“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名字，就是要人们学习青兰，做孔孟之道的忠实信徒，以便推行他们“复礼”、复辟的反革命政治路线。

第三，《三上桃峰》的炮制者，采用含沙射影的卑劣手法，使用刘少奇、林彪的反革命语言，诬蔑社会主义制度，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进行诋毁和谩骂。

全剧结构的中心是马。戏的开头，作为主要人物的青兰，在初上场的唱段中唱道：“持续跃进，万马奔腾”；接着，在同一场，她又唱道：“他扬鞭催马猛驰骋，菊花青怎经得猛烈奔腾”，于是，全剧就围绕着这匹病马兜起圈子来。剧本告诉人们，这是一匹患有“脑迷症”，“病了好几个月”的病马，此马“千万不能猛骑快跑”。后来，它被猛骑了一阵，由于“快速奔跑使猛劲”，就“浑身淌汗，四肢发抖”，卧倒在地，终于死去了。对此，剧本叫嚷“要接受教训”。好一个“接受教训”！须知这个剧本是把故事的发生年月别有用心地改在一九五九年春天的。这时，正是我国人民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高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革命红旗高歌猛进的年代。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剧本刻意讲述一个“跑死病马”的“寓言”，它的矛头所向难道还不清楚吗？这种咬牙切齿的咒骂，和赫鲁晓夫对我们的诬蔑有何不同？和刘少奇攻击大跃进是“搞的太猛，出了毛病”的黑话，有何不同？和林彪一伙攻击大跃进是“凭幻想胡来”的黑话，有何不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是否定不了的，人民群众的劳动所结出的胜利果实是抹杀不了的，这种咒骂只能暴露出这个戏的炮制者完全站在地、富、反、坏、右的立场上。更有甚者，当剧本写到病马累死之后，另一匹马就立即登场了。这匹大红马是由剧中资本主义势力的代表人物老六牵上台的。这匹象征着资本主义“胜利”的马一上场，就博得了满台人物的一片喝采：“好马！好马！好马！”连用三个“好”字。无需再做解释了，作者的用心已十分明白。他们就是要通过这两匹马的对比，咒骂党的正确路线，呼唤资本主义复辟。

晋剧《三上桃峰》大肆兜售刘少奇、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黑货，对毛主席革命路线进行肆无忌惮的攻击。他们叫嚷这出戏要表现的“大主题”，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为刘少奇、林彪和他们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翻案。有人还叫嚷这出戏“好就好在突破了样板戏的框框”，这就赤裸裸地暴露了他们与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为敌、与革命样板戏为敌的反动面目。《三上桃峰》正是顽固地坚持刘少奇反革命的修正主义文艺黑线，集“无冲突论”、“中间人物论”、反“题材决定”论、“人性论”、“时代精神汇合论”之大成的大毒草。



三

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阶级斗争的历史告诉我们：每当一次伟大的革命运动过去之后，总是伴随着一场复辟与反复辟、倒退与反倒退的激烈斗争。一切被打倒的剥削阶级决不会甘心于他们的失败，总要作垂死的挣扎，妄图复辟他们失去的“天堂”。他们进行复辟的一个常见方式，就是利用文艺为历史上被打倒的剥削阶级的代表人物进行翻案。六十年代初，有人抛出《海瑞罢官》为彭德怀翻案，如今又冒出个《三上桃峰》为刘少奇翻案，就是这一阶级斗争规律的生动例证。

从《一匹马》、《三下桑园赎马记》，到《三下桃园》，再到《三上桃峰》：桑园改桃园，桃园变桃峰；一匹病马上台又下台，下台又上台。这说明了什么？说明了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是很激烈的。不管革命的阶级怎样事先警告，把根本的战略方针公开告诉自己的敌人，敌人是一定要寻找机会表现他们自己，还是要进攻的。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要想避免，也不可能。它说明了文艺战线上的斗争从来就是政治战线上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反映。某些地区、某些部门修正主义文艺黑线回潮的现象，就是政治上那股妄图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翻案风在文艺上的表现；这也是和国际上阶级敌人反华、反共、反革命的反动逆流相呼应的。它还说明了当前深入开展的批林批孔运动，击中了国内外阶级敌人的要害，他们必然要跳出来进行破坏和捣乱。

因此，我们对大毒草《三上桃峰》的批判，不是一般的文艺论争，不是什么创作问题，而是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成果的大是大非问题；是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大是大非问题；是深入开展批林批孔运动、把上层建筑领域里的革命进行到底的大是大非问题。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这样的斗争，今后还要长期地进行下去。

毛主席教导我们：“不要以为有一二次、三四次文化大革命，就可以太平无事了。千万注意，决不可丧失警惕。”“三上”被揭露了，会不会搞“四上”“五上”呢？值得我们深思。我们一定要以党的基本路线为纲，深入开展批林批孔运动，重视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密切注视思想文化战线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和新特点，反击一切开倒车、搞复辟的逆流，击退反革命的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的回潮，进一步发展无产阶级文艺革命的大好形势，夺取新的胜利！

（原载一九七四年二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



抓革命 促生产 促工作 促战备

从农业出发办好地方工业

庄 宁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我国的地方工业呈现出一片蓬勃兴旺的景象。钢、铁、煤、电等基础工业，直接为农业服务的机械工业、化学工业，以及具有不同特点的轻工业，各地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地、县办的和社、队办的“五小”工业，星罗棋布，遍及城乡。地方工业的发展，有力地支援了农业，促进了农业的发展，也促进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这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形势大好的标志之一。

发展地方工业的经验又一次证明：“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各级领导和广大人民群众，经过深入批判刘少奇、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提高了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自觉性，遵循“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坚持立足于农业、服务于农业的正确方向，从而促使我国地方工业的面貌发生了新的变化。要进一步加快地方工业的发展，最根本的是必须抓大事，抓路线。当前正在进行的批林批孔斗争，是批林整风运动的继续和深入，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头等大事。搞好这场斗争，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抓紧抓好这件大事，才能促进各项工作的胜利开展。我们应当深入地进行批林批孔，按照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政策，认真总结经验，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加深对社会



主义工农业发展规律的认识，在中央统一计划下，为加速农业的发展，继续办好地方工业。

从农业出发办地方工业，需要在中央的统一计划下，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发展地方工业，加强对农业技术改造的物质基础，这是进一步发展我国农业生产的一个迫切要求。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随着农业学大寨运动的不断发展，大规模的农田基本建设，耕作制度的改革，复种面积的扩大，要求工业提供更多更好的机械、工具、化肥和其他产品。这就不仅需要中央办的现代化大型企业发挥支援农业、武装农业的骨干作用，而且尤其需要积极发展地方工业，以适应农业的需要，促进农业的发展。我国农业正处在机械化的过程中，需要工业提供物质技术装备的数量是很大的；而且地域辽阔，各地区的自然条件差别很大，经营的农业生产项目各不相同，生产工具也不尽一样，要求工业提供的技术装备也是各种各样的。在这种情况下，仅仅依靠中央的大型企业，不积极发展地方工业，就不能完全满足发展农业生产的这种大量的、多方面的需要。在中央的统一计划下，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根据本地区的具体情况，努力发展地方工业，使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同时并举，就能更好地发挥工业的主导作用，更加有力地支援农业，推动农业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

工业基础比较薄弱的地方，能不能多快好省地发展地方工业？关键在于路线。广西横县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前，由于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使得有的同志滋长了依赖、等待的思想，缺乏积极性，结果，县办工业发展很慢。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他们批判刘少奇、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提高了办工业的积极性。他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围绕农业的需要，积极发展地方“五小”工业。现在，这个县已拥有钢铁、煤炭、农机、化肥、水泥、农药等县办厂矿四十多个，为支援农业连年丰收贡献了力量。地方工业从基础薄弱到基础雄厚，从不完善到比较完善，需要有一个发展的过程。一个雄厚的工业基础总是从薄弱的基础



开始的，任何比较完善的工业产品也都是从不完善来的。只要我们路线对头，有从农业需要出发办地方工业的积极性，总是能够把事情办好的。大的做不了可以从小的开始，复杂的还不会做可以先搞简单一点的，有的项目今年不能办，明年可能办起来，今年办得不那么好的，明年后年可能办得好。这样，在支援农业的过程中，地方工业就能从小到大，由低级到高级，比较迅速地发展起来。

当然，在工业基础比较薄弱的条件下来发展地方工业，困难是比较多一点。我们应该正视这些困难。但是，更应该看到，社会主义制度为迅速发展地方工业开辟了广阔的前景。我国的工人阶级、广大劳动群众成了国家的主人，“群众中蕴藏了一种极大的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为了加快农业生产的前进步伐，广大群众不但有发展地方工业的高度积极性，而且有发展地方工业的智慧和力量。充分发挥地方积极性问题，归根到底就是依靠群众，走群众路线的问题。群众积极性调动起来了，什么困难都能克服，什么问题都好解决，没有资金自己筹，不懂技术就在实践中总结提高，缺乏设备，就土法上马，土洋结合，就能够因地制宜地办很多的事情，使地方工业较快地发展。

采取积极的态度，认真办好直接为农业服务的支农工业，这是发展地方工业的一个重要的问题。支农工业是直接为农业生产提供先进技术装备的。支农工业办得越好，对农业提供的先进技术装备数量越多，质量越高，工业对农业的主导作用就越明显。同时，支农工业对农业的支援效果越大，农业发展的速度越快，就能为地方工业提供更多的粮食、原料、劳动力和广阔的市场，使地方工业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之上。不仅如此，支农工业的发展，要求基础工业为它提供更多的钢、铁、煤、电，这就逼着基础工业加快前进的步伐，以适应支农工业发展的需要。因此，认真办好支农工业，是地方工业坚持从农业出发，全心全意为农业服务的重要表现。

支农工业是适应农业发展的需要应运而生的。但是并不等于只要办支农工业就自然而然地为农业服务了。先办什么，后办什么，生产什么，不生产什么，都



得从农业的实际需要出发，才能坚持为农业服务的方向。农业的需要是多方面的。对支农工业，既要求有制造，又要求有修理；既要求有主机，又要求有配件；既要求数量多，又要求质量好；既要求适应不同地区的特点，又要求供应及时，价格低廉。支农企业如果重视主机，轻视配件，注意一个方面的需要，忽略另一个方面的需要，就很难全面满足农业的需要。同时，农业的需要又是发展的、变化的。不同的发展阶段，不同的季节，都有不同的需要。支农工业如果不注意农业生产的这种不同情况，仍然是老品种，老规格，就不可能收到支农的实际效果。这个问题解决得好不好，是检验一个支农企业是不是全心全意为农业服务的重要标志。因此，支农工业要做到产品为农民所欢迎，不能简单地以为生产某种支农产品就算完成了任务，而是要做很多艰苦细致的工作才能实现。要使自己的思想、作风、规章制度等适应支农的需要，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了解农业，熟悉农业，自觉地做到从农业的需要出发，想农业之所想，急农业之所急。这样，才能使支农产品适应农业生产情况的变化而变化，使支农工业随着农业的发展而发展。

要办好支农工业，还必须认真地考虑到农业提供的可能。为了发展农业，想多办一些支农工业，这种积极性是好的。但是，经验告诉我们，办支农工业同样要考虑农业所能负担的实际可能。办工业，即使是支农工业，对农业有支援、促进的一面，也有对农业依赖的一面。如果光看支援一面，忽视依赖一面，光讲需要不看可能，在同一个时期，企图百业并举，那就会在资金、物资、劳动力上与农业发生矛盾，甚至去挤农业，把支农变成“挤”农。这样一来，地方工业的发展也势必受到影响，甚至也可能被挤下来。即使在农业丰收的情况下，也要在充分估计群众积极性的基础上，冷静地考虑实际的可能性，决不能忘乎所以。应该分别轻重缓急，该办还是不该办，先办还是后办，集中办还是分散办，上面办还是下面办，等等，进行全面规划，以便集中力量，对准方向，从解决主要矛盾入手，更好地支援农业。



从农业出发办好地方工业，还必须重视发展轻工业。轻工业是国民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农业和重工业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不能认为“轻工业多些少些没有关系，挤点让点没有问题”。农业生产的粮食和各种经济作物，常常要经过轻工业的加工，才能成为生活资料，以满足人民生活多方面的需要。农村作为工业的广阔市场，也需要向轻工部门出售各种原料，才能增加集体和社员收入，从而吸收大量的工业品。同时，轻工业的特点是，投资少，收效快，积累多。认真办好轻工业，就能较快地增加地方积累，以较多的资金支援农业和重工业。广西壮族自治区在发展农业和重工业的同时，注意了轻工业的发展，使轻工业生产有较大幅度的增长。一九七〇年以来，轻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百分之十三，全区轻工业每年提供的积累（包括手工业所得税），约占全区财政总收入的三分之一以上。这就说明，发展轻工业不是“可挤可让，可多可少”的，而是从农业出发办好地方工业的一个重要环节。

毛主席说：“没有农业，就没有轻工业。”毛主席这一指示，深刻地揭示了农业与轻工业的关系，指明了发展轻工业从农业出发的必要性。轻工业是加工工业，有没有人去加工，有没有原料可供加工，加工出来的产品能不能销出去，那一样都与农业有直接关系。目前，我国轻工业的原料大部分来自农业，农业发展的情况，对轻工业发展的规模大小、速度快慢，影响就更大。从农业出发办轻工业，就要在国家的统一计划下，使轻工业的重点和布局适应农业的实际情况。也就是说，要根据各地农业生产的自然条件，资源情况，技术基础，因地制宜地确定在什么地方办什么厂，办多大规模的厂。既要充分利用当地有利条件，发挥地方特长，又不使之出现“办新厂，挤老厂，办小厂，挤大厂”的现象。例如，在适宜发展甘蔗生产的地区，就可以重点发展糖厂，在水果产量较多的地方，就可以重点建立食品加工厂。这样，轻工业立足于地方资源，就能有充足的原料，得到更快的发展。如果看不到农业对轻工业的基础作用，就轻工业抓轻工业，就加工搞加工，就常常会使轻工业缺乏原料，造成劳动力、资金和设备的浪费。结果想



快反而慢，甚至还会扯农业的后腿。

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是从农业出发办好地方工业的根本保证。在办地方工业的过程中，办什么厂，不办什么厂，生产什么产品，不生产什么产品，始终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斗争。是坚持政治挂帅，还是搞利润挂帅，就是两条路线斗争的重要表现。许多为农业服务的支农产品是薄利多销的。同时，办地方“五小”工业的资金主要是地方自筹，收益主要也是归地方分配。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往往容易从利润出发，只看到某种企业可以多盈利，某种产品可以多赚钱，而不讲农业需要，不顾国家统一计划，把工业支援农业的社会主义协作关系，看成是单纯的商品交换关系。那样就会使地方工业背离社会主义方向，为资本主义开方便之门，给阶级敌人搞贪污盗窃、投机倒把活动以可乘之机。要坚持从农业出发办好地方工业，就必须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开展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保持清醒的头脑，分清路线是非，坚持政治挂帅，反对利润挂帅；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反对资本主义倾向。如果离开了党的基本路线，我们就会迷失方向，地方工业就会滑到修正主义路线上去。

因此，我们办地方工业，不能只抓办工业的日常事务，要抓办工业的根本大事。要认真搞好批林批孔，深入进行反修防修的教育，联系办地方工业中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实际，继续批判修正主义的办企业路线，批判资本主义倾向，打击阶级敌人的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等破坏活动。要使办地方工业的广大干部和群众，都认识到发展地方工业并不是单纯经济问题，而是为了加强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的物质力量；认识到工业支援农业，也不是单纯的工农业两大生产部门的互相协作问题，而是无产阶级支援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方面，是巩固工农联盟的重要措施；从而做到高瞻远瞩，胸怀全局，自觉地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服从国家统一计划，保证地方工业沿着为农业服务的轨道前进。



让工农兵英雄形象牢固地 占领故事片阵地

江 天

最近,新摄制的几部彩色故事影片的同时上映,给新春的文艺生活增添了丰富的内容。影片上映以后,受到广大工农兵群众的热烈欢迎,在国际上也引起了很大的注意。这批影片和最近在华北地区文艺调演中出现的一批优秀剧目汇合在一起,显示了我国电影戏剧战线的繁荣景象。这对于那些诬蔑文化大革命后电影戏剧事业“今不如昔”的论调,是一个有力的回击。

革命故事片的创作,是在革命样板戏的推动下搞起来的。前几年,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亲切关怀下,革命样板戏搬上了银幕,不仅在广大工农兵群众中普及了革命样板戏,而且积累了如何运用电影艺术的规律来塑造无产阶级英雄形象的拍摄经验。这对故事片的创作是具有重要意义的。新摄制的几部彩色故事影片,学习了革命样板戏的创作经验和拍摄经验,因而也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无产阶级文艺革命的战果。

这里,想概要地谈一谈《火红的年代》、《艳阳天》、《青松岭》这三部故事影片所取得的可喜成就和不足之处。

这批影片所反映的题材,都是社会主义时代工农业战线上的火热斗争生活。当我们看到《火红的年代》中的炼钢工人,顶住社会帝国主义刮起的妖风,敢于打破洋框框,炼出了“争气钢”;看到《艳阳天》中的东山坞贫下中农,与天斗,与地斗,与阶级敌人斗,百折不挠地要走社会主义道路;看到《青松岭》中的老饲养员,一把夺过赶车的鞭杆子,大长了贫下中农的志气,大灭了阶级敌人的威风的时候,我们怎能不为影片中所展现的壮丽情景激动得久久不能平静?这些故事影片热情地歌颂了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胜利,歌颂了革命人民的崇高精神,这对于当前各条战线都是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鼓舞作用的。这些影片所以受到工农兵群众的热烈欢迎,首要的原因就在于作品的题材来自三大革命运动。



故事片选择什么题材，是关系到创作方向的大问题。毛主席指示我们，要表现“新的人物，新的世界”。陆定一、周扬一伙却以所谓反“题材决定”论跟毛主席的指示相对抗。在他们的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统治下，大部分故事片的取材，或是琐碎的家务事，或是帝王将相的封建霸业、才子佳人的风流韵事。就在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后的今天，不是还有人不愿去表现三大革命运动的重大题材，却热衷于写什么生活中的小磨擦吗？更有甚者，竟还有人公然把为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翻案的黑戏改头换面，拿到社会主义舞台上展览！这也说明了文艺上的两条路线斗争远远没有结束。所以，当我们为故事片创作的新成就而高兴的时候，还必须同时反击文艺黑线回潮，继续批判反“题材决定”论，为工农兵英雄形象牢固占领文艺阵地而进一步扫除障碍。

《火红的年代》、《艳阳天》、《青松岭》所反映的斗争生活都发生在文化大革命前，但都能立足于今天的时代高度去处理题材，提炼主题。因此，它们既比较准确地再现了那个时期的斗争生活，又使主题具有今天的思想高度和鲜明的时代精神。《火红的年代》没有停留在炼钢生产的技术问题上，它从一开始就提出了一个事关路线的大问题：要不要炼“争气钢”，实际上就是敢不敢坚持走毛主席指出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道路的问题。今天，摆在我们每个革命同志面前，仍然有一个敢不敢“争气”的问题。敢于“争气”，就是敢于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敢于反潮流，敢于拿出革命闯劲来，不怕承担责任和“冒风险”。只要我们敢于这样，就必然能创造出人间奇迹来。影片正是从这个思想高度给人们以丰富的联想，使我们亲切地感受到毛主席革命路线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生命线。《艳阳天》表现的虽是农业合作化时期在分配问题上的两条道路斗争，但由于原作者和编导者努力运用党的基本路线去观察和概括生活，这就深刻地表明了东山坞的这场斗争，其实是整个社会阶级斗争的一个缩影。它告诉我们：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取得基本胜利之后，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还要进行长期的斗争。《青松岭》也同样如此。它围绕着由谁执鞭赶车的问题，以这个具体矛盾反映普遍规律，说明了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阶级敌人决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仍然要同我们作长期的反复的较量，他们玩弄的手段极为狡猾，我们必须百倍提高革命警惕。这一切都充分证明，社会主义的电影创作，只有以党的基本路线为指导，才能站在时代的高度，从千差万别的特殊矛盾中揭示出带有规律性的内容，从而使主题思想具有深刻的教育意义。这几部影片所表现的斗争生活，离开今天已有



十几年了，为什么它依然能激励我们的革命斗志，其道理就在这里。

当然，深刻的主题思想必须通过丰满的无产阶级英雄形象才能得到体现。这几部故事影片所取得的成绩，最突出的方面，就表现在赵四海、肖长春、张万山等无产阶级英雄人物，生气勃勃地走上了银幕中心。

这几个英雄人物的共同特征，是具有高度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这一共同特征，在不同的英雄人物身上，又有其具体表现。在赵四海身上，是他强烈的革命反潮流精神；在肖长春身上，是他带领群众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硬骨头精神；在张万山身上，表现为不怕年老有病，敢于同资本主义歪风邪气作不疲倦的斗争，热心培养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他们一个个犹如巍然挺立的青松，泰山压顶不弯腰，风吹浪打不回头，坚定不移地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都不愧为我们社会主义时代的顶梁柱。看，赵四海面临被撤职的压力，却毫无惧色：“你可以停我的职，但是，钢是要炼下去的，自力更生的道路，我们走定了！”肖长春顶住失去孩子的悲痛，一语揭穿阶级敌人的毒辣阴谋，劝父亲：“你挺起腰板来，让那些坏蛋们看看，搞社会主义的人都是硬骨头！”万山大叔回击了敌人钱广的要挟，在夺鞭之后，响亮地回答：“要让大车走正路，咱不掌鞭，谁掌鞭？”这些发自英雄内心的语言，铮铮有力，铿锵作响，抒发了中国无产阶级在社会主义创业过程中的大无畏的革命气概，使这些英雄形象闪烁着光辉的时代精神。

这几部影片在塑造主要英雄人物方面，努力学习和运用了革命样板戏的创作经验。如在一九六五年拍摄的影片《青松岭》中，主要英雄人物是方纪云还是张万山，很不清楚，谁有戏就给谁，平分秋色，结果谁也突出不了。新摄制的影片《青松岭》，分清了主次，以张万山这一英雄人物为中心进行布局，摆正了他和其他人物之间突出和陪衬的关系，从而使张万山的英雄形象得到了充分的刻画。如对“夺鞭”这场高潮戏，进行了周密的布局。在夺鞭之前，安排了秀梅发现并关心万山大叔的腿病，张万山向青年痛诉落下腿病的遭遇等情节，这一切渲染就为后来张万山迈开病腿、跃上高坡夺过鞭子的高潮戏作了铺垫。而在张万山夺过鞭子之后，影片接连用了几个特写镜头，表现秀梅、大虎、方纪云的惊喜、感动心情，又作了渲染。这就不仅使夺鞭这一主要事件展示出张万山的坚强性格，而且在设计其他人物和事件时，也以他为中心，使张万山的性格光辉集中投射在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这一思想焦点上。影片《艳阳天》为了突出主要英雄人物肖长春，在改编中也进行了再创作。比如，小说中“一锅野菜”的细节是用来描写马老四的，现



在影片用它来刻画肖长春，并把它插在弯弯绕受了马之悦的挑动而跑到肖长春家门前闹“缺粮”的情节中间，当肖家的锅盖一揭开，就产生了强烈的艺术效果：肖长春把仅有的半袋小米献给集体喂牲口而自家宁可吃野菜，并且还不准小石头告诉人，这种崇高的精神境界和马之悦的卑鄙行为、弯弯绕的私心杂念形成了极其鲜明的对比！正是这一对比，使弯弯绕深感内疚，使肖长春的形象更加饱满，也使得戏剧矛盾比小说更集中、紧凑了。

为了突出主要英雄人物，影片还调动了电影艺术手段。如在张万山深情地讲述自己为什么要夺鞭的这场戏里，导演为了揭示张万山的内心世界，对这一大段激动人心的对白的处理，没有用分切很碎的镜头，而是用了一个长镜头，在镜头内部进行场面调度，造成符合人物心情、能恰当表现人物情绪的各种景别，从而表现了张万山在孙福逼他交鞭、周队长对他不信任、方纪云为他担忧的特定情景下，他全心全意为革命、为人民的崇高共产主义思想。这个长镜头为演员提供了表演的有利条件，而扮演张万山的演员也很好地利用了这一条件；他在整个影片里都是演得朴实而又亲切的。在《火红的年代》中，赵四海批评白厂长“已经不象我们工人的厂长”时，导演用了一个近景，着重去表现赵四海的眼神，使这一英雄人物既为白厂长的思想蜕化而痛心、但又热切地希望他早日转变的不平静心情，得到了细致的刻画。又如《艳阳天》中有一个画外钟声的渲染，也是很有深意的。当群众在马之悦诱骗下纷纷离开打麦场去寻找孩子时，肖长春立刻洞察到一场严重的暴风雨已经来临，他压下满腔的怒火和悲痛，飞步来到大树下，用力拉动钟绳。这宏亮的钟声，烘托出肖长春千言万语难以表达的心声，震撼了整个山村，使阶级亲人惊醒过来，团结起来，使阶级敌人感到末日来临。由于努力调动电影艺术手段去展现英雄人物的共产主义精神境界，这几部影片不仅在思想性上，而且在艺术性上也达到了新的水平。它们在取景、色彩、用光、画面处理等方面，也都较文化大革命前拍摄的影片有了很大的提高。

为了进一步促进故事片创作的发展，我们必须坚持高标准、严要求，必须重视创作思想中存在的问题。前一个时期，在故事影片的创作方面所以进展比较缓慢，有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在创作思想上还存在着“无冲突论”的问题。这三部影片在揭示矛盾冲突方面，总的来说写得还是好的，表现了强烈的时代感，但也存在着一些缺点。《火红的年代》能够在广阔的历史背景上去反映路线斗争，很富有现实意义，可是阶级斗争这条线并没有写好，它未能与路线斗争有机地结合起



来。应家培这个暗藏的阶级敌人面目不清，行动缺乏内在的根据，他搞破坏放的究竟是什么，也没有交待清楚，因而阶级斗争这条线显得是游离的。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主题的深化。《艳阳天》着实写了阶级斗争，但还不敢充分地激化矛盾。这只要把影片同小说原著比较一下即可看出。马小辫几次持刀想杀肖长春的情节在影片中去掉了，这就显出不如小说写得那么尖锐复杂。影片让小石头不死，这是改得好的地方，但既然孩子未死，那些哭哭啼啼的渲染就显得多余，并且还影响了矛盾冲突的高潮。《青松岭》在敢于激化矛盾这一点上比前两部影片写得好，但写矛盾的解决还比较简单。解决矛盾的关键，落点不在张万山身上，而是靠外调材料，这实际上是避开斗争，避开英雄人物来解决矛盾。

社会主义文艺反映生活，从本质上说就是反映现实中的阶级斗争。而“无冲突论”，则否定了社会阶级矛盾、阶级斗争的存在，因而违背了文艺反映生活的根本规律。刘少奇、林彪一伙在政治上贩卖“阶级斗争熄灭论”，在文艺上鼓吹“无冲突论”，都是出于一个政治目的，妄图改变党的基本路线和政策，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宣扬阶级调和，否认阶级斗争，这是剥削阶级在阶级斗争中惯用的手法，中外古今，概莫能外。在当前批林批孔运动中，我们必须联系文艺战线上的路线斗争的实际，狠批孔老二的“中庸之道”，狠批林彪反对马克思主义斗争哲学、宣扬“两斗皆仇，两和皆友”的修正主义谬论，从根本上肃清“无冲突论”的流毒。

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任务是塑造无产阶级英雄典型。生活中无产阶级英雄人物都是在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涌现出来的。我们的作品所反映的矛盾冲突离开了阶级斗争这个纲，就塑造不出无产阶级英雄典型。所以，在创作中，我们一定要牢记党的基本路线，从实际生活出发，敢于揭示阶级斗争，敢于写矛盾的激化，敢于写两类矛盾的转化，并努力学会写好矛盾的解决，力避手法雷同，相互模仿。如果在创作过程中，出现这样那样的错误和缺点，也不要怕，可以通过实践，总结经验，改正错误，努力学习，不断提高。

这几部故事片的出现，是一个良好的开端。既然是开端，就不可能十全十美。革命样板戏已为我们的社会主义文艺创作打开了广阔的道路，我们坚信，只要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文艺路线，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深入到工农兵群众中去，我们就一定能够拍出更多更好的故事影片来！



科 学 史 研 究

人类对地球的认识和改造

李 之 棣

人类能不能正确地认识地球和能动地改造地球，这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而首先是一个实践问题，它完全可以由人类本身社会实践的历史来说明。

人类是地球发展的产物。大约在二百万年前，当地球表面温度下降、冰期到来的时候，森林面积的迅速缩减迫使人类的祖先——古猿从树上移居地面，于是手脚开始分化，直立行走，完成了从猿到人的决定性一步。在原始时代，火山爆发，电闪雷击，引起森林起火是很可怖的，但人们却从中得到启发，“钻燧取火”，“焚林而田”；在同水这种自然力的斗争中，人们学会了刻木为舟，捕鱼为食；自然界“草木榛榛，鹿豕狂狂”，人们却逐步把野生植物栽培为作物，把野生动物驯化为家畜。人类就是同冰期、火山、洪水、猛兽等险恶的自然条件作艰苦斗争中，逐步改造了自然，也改造了自己，提高了对自然规律的认识，扩大了自己的自由。

这个历史过程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充满了大大小小的曲折。如我国古书中有在黄河流域“塞九河以广田居”的记载。这是一项气吞山河的壮举，但由于没有很好掌握自然规律，引起了水患。水患有两重性：它危害人民的生产和生活，又推动人民去掌握治水的规律，于是，人们在长期的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过程中，通过多次总结经验，终于逐步学会了治水本领。两千多年前，我国人民就造出了象四川都江堰那样伟大的水利工程。广大劳动人民从战天斗地的实践中逐渐认识到人定胜天这一真理。我国广为流传的“愚公移山”、“精卫填海”等民间寓言，就是人定胜天的英雄气概的生动写照。



自从人类分化为阶级以来，“各种形式的阶级斗争，给予人的认识发展以深刻的影响”。（《实践论》）人民群众是认识和改造地球的主体，他们是按照地球本来的辩证法来逐步认识地球的。而一切反动阶级总是歪曲和掩盖地球运动的客观规律，宣扬唯心论和形而上学。在人们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由局部到全体地认识和改造地球的历程中，始终存在着两个阶级和两种世界观的激烈斗争。在斗争中，唯物论和辩证法不断得到发展，唯心论和形而上学不断遭到破产。这个斗争，今天还在继续。回顾人类对地球认识和改造的历史，可以使我们对于未来充满信心，彻底驳斥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的种种悲观论调；使我们进一步懂得辩证唯物论是唯一正确的世界观，是认识和改造地球的锐利武器。

“地方”还是“地球”，地球是不动的还是运动的？

人类究竟生活在什么样的天地里？围绕这个问题，两种世界观展开了长期反复的斗争。

古代人是在狭小范围里从事生产的，所以认识很受局限。在我国，曾有“天圆地方”的看法。那时人们对许多自然现象不能科学地解释，产生了对自然的信仰和种种臆测，还往往把天地人格化，例如说天圆象头顶，地方象双脚，天有四时，人有四肢等，并逐渐引出神的观念。正如恩格斯所说：“思维对存在、精神对自然界的关系问题，全部哲学的最高问题，象一切宗教一样，其根源在于蒙昧时代的狭隘而愚昧的观念”。（《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在阶级社会里，对天地的唯心论的愚昧观念被剥削阶级利用，炮制成愚弄和压迫人民的精神枷锁。如我国没落奴隶主阶级的代表孔丘，就鼓吹“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的天命论；西汉的儒家代表董仲舒也宣扬“天人感应”和“君权神授”的谬论。这都是为反动统治服务的。

但是，一些亲身参加生产实践的人们，根据直观经验，坚持从自然本身说明自然。他们认为大地和海水一样是一个略有起伏的平面。随着航海事业的兴起，人们开始用天象导航，当沿南北方向航行时，发现北极星高度有变化；从陆地远望迎面驶来的航船，也是先见桅顶后见船身，这些情况只能用海面和地面弯曲来解释。在我国曾有“天如覆盖，地如覆盆。地中高而四隤，日月随天转运”的看法。就是说，天地都是一个大穹隆，只不过地比天缓平一些罢了，但仍然以为几



千里外天和地是连在一起的；天动，而地不动。东汉时，一些商人和旅客发现，从西域到东海之滨相隔万里，所看到的太阳和月亮几乎一样大小，于是对天地相连的说法发生了怀疑。唯物论者王充就曾明确指出，天地是不相连的。科学家张衡根据月亮圆缺的变化，指出月亮只反光不发光，而月蚀是地体的阴影，设想大地是一个球体。在东汉时很多人开始相信“天地之体，状如鸟卵，天包地外，犹壳之裹黄”。在西方的同一时代，从古希腊人亚里士多德到古罗马人托勒密，对于地球形状也经历过这样一个由片面到全面的逐步认识过程。从“地方”到“地球”，确是人类认识世界过程中唯物论对唯心论的一次巨大胜利，这胜利打破了人们对天地的神秘观念，从而视野顿开，并为地动说提供了前提。如我国宋代唯物主义哲学家张载就认为地球是动的，并用地动来说明一些天文现象。在中世纪的西方，随着封建阶级日趋反动，大地球形假说被纳入了为宗教服务的托勒密地心说和地球不动论。

十六世纪以来，资本主义生产兴起，伴随着一系列地理发现，完成了具有历史意义的环球航行，大地球形假说被证实了。正如恩格斯所说：“只是在这个时候才真正发现了地球，奠定了以后的世界贸易以及从手工业过渡到工场手工业的基础，而工场手工业又是现代大工业的出发点。”（《自然辩证法》）也正是在这个时期，哥白尼根据前人积累的天文材料，提出了科学的日心说。他的《天体运行》一书，是对教会权威的宣战，从此自然科学开始从神学中解放出来。人们认识到，人类居住的地方——地球，原来不是什么上帝所赐予的宇宙中心，而是太阳系中一颗运转着的星球。

地球上的自然条件变不变，是突然“灾变”还是有规律地变？

地球上的自然条件变不变？对于这个问题，自古以来也有两种对立的看法。一种是变，例如我国古代就有“沧海变桑田，桑田变沧海”的说法；另一种是不变，董仲舒就认为“天不变，道亦不变”。

十八世纪的欧洲，资本主义生产分工越来越细，自然科学门类的划分也日益增多，这本来是生产与科学的进步，但同时又使人们局限于自己的专业领域中，往往失去全面观察事物的能力，把事物看成是孤立的、静止的、一成不变的。林奈的物种不变论和牛顿的机械论便是这样一股思潮，影响到自然科学一切领域。例



如，人们认为山河湖海自从被创造出来就是这个样子，以后也不会自行改变。由于这个论点有利于反动统治而得到宗教势力的大力支持。康德——拉普拉斯天体起源假说“**在这个僵化的自然观上打开第一个缺口**”，（《自然辩证法》）它启发人们考虑，如果地球是逐渐形成的，那么地球上的地质、地理、气候状况和生物区系也不会一成不变，并且有它自己的形成过程。但是最能驳斥不变论的是人们的实践，例如，在欧洲兴修水利和开发矿业时，普遍找到了海生贝壳和珊瑚化石，这就说明这个大陆过去曾是一片汪洋。神学家们最初妄想用圣经上说的诺亚洪水来解释这一切。但是接着人们又发现，有的岩层是倾斜的，在倾斜的岩层的侵蚀面上往往又覆盖着另一套水平岩层。英国人郝屯正确地指出，这是海底沉积的水平岩层先经地壳运动褶皱隆起，被流水夷平后，再经地壳运动而下沉，在上面重新沉积了水平岩层。这一发现向不变论提出了新的挑战。

在自然科学的自发辩证法的步步逼迫下，宗教势力变换了手法，一方面不得不承认地球上自然条件是在变；另一方面又鼓吹这是上帝为了惩罚万物而发动的灾变，并用高官厚禄鼓励人们用科学成果加以论证，于是种种奇谈怪论就相继出现了。有人说所有的山脉都是突然形成的，每次造山就是一场灾难；有人说在西伯利亚冻土中发掘出的皮、肉、毛保存完好的猛犸象本身是热带动物（后来证明是寒带动物），是在气候骤然变冷时活活冻死的；尤其是考古发现意大利的两个大城镇在一次火山喷发时被埋在火山灰之中，更引起了广泛恐怖。宗教势力抓住这些尚未得到科学阐明的地质现象大力渲染，宣称既然人们的生命危在旦夕，还搞什么革命！快祈求上帝保佑吧！

生物学家居维叶就是利用巴黎盆地动物化石的研究成果来支持岌岌可危的神学的。他在地层剖面中也看到了一系列地层不连续的现象，而且每个侵蚀面上下的岩层中所含的化石动物的形态和构造不同。居维叶从物种不变论出发，武断地认为，生物物种的这种变化不是自然发生的，而是由一种异常突然的超自然力完成的，地层中每个不连续代表一次大灾变。他还根据一些假象臆造出最后一次灾变发生在五千多年前，以与圣经上的诺亚洪水相附会，并恶意地把这种灾变叫作“革命”。因此，当他的代表作《地球表面的革命》出版之后，立即得到封建王朝的加官晋爵。恩格斯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居维叶关于地球经历多次革命的理论在词句上是革命的，而在实质上是反动的。它以一系列重复的创造行动代替了



单一的上帝的创造行动，使神迹成为自然界的根本的杠杆”。（《自然辩证法》）实际上，在居维叶的“灾变”后面，隐藏着林奈的不变，同样给上帝留下了位置。

当时，欧洲有些进化论者曾试图从生物进化的角度批驳灾变论，由于论据不足，没有成功。随着矿冶生产的进一步发展，地质资料日益增多，许多地质现象也得到了阐明，这就为从地质学角度批驳灾变论准备了条件。给予居维叶灾变论以致命一击的是地质学家赖尔。他在《地质学原理》一书中，用当时所能搜集到的丰富材料批驳了灾变论。赖尔首先研究了地表各种自然力对岩石的剥蚀、搬运和堆积过程，认识到过程是缓慢的。当他把现代地质过程同欧洲的第三纪地质过程加以比较时，发现两者十分相似，据此提出：“现在是认识过去的钥匙”，从而确立了“将今论古”的地质学方法。在这个方法指导下，赖尔又用现代地壳缓慢升降运动去说明地层剖面中的各种现象。在他看来，过去曾发生过的地壳缓慢的升降并没有什么神秘，也不需要什么超自然的力量，完全可以用人们现代所看到的地质过程来理解。后来，赖尔又根据人们逐步建立起来的地层系统表，考虑到岩层形成的缓慢程度和地壳反复升降的情况，科学地估算出地球的年龄绝不是圣经上所说的几千年，而是数以万万计。地球有着自己实在的历史，而地壳中成千上万米厚的地层就是一部地球史教科书。尽管赖尔对地质过程的认识存在着缺陷，恩格斯仍给予他很高的评价，指出：“只是赖尔才第一次把理性带进地质学中，因为他以地球的缓慢的变化这样一种渐进作用，代替了由于造物主的一时兴发所引起的突然革命”。（《自然辩证法》）不变论及其变种——灾变论从此宣告破产。

从此，人们认识到象流水、冰川和风这些外动力，不断把陆地上的岩层毁坏，并将其碎屑搬运到江河湖海中去，这些松散堆积物经过千百万年逐渐硬化成岩；而象地震、岩浆活动一类内动力，则将地下岩浆带到地表，并将海底的岩层抬出水面形成山脉和岛屿，使之重新遭受外动力的毁坏，从而形成“旧岩层不断毁坏和新岩层不断形成的系列”。（《反杜林论》）这样，一方面是外动力在使地面趋于平缓；另一方面是内动力在使地面趋于起伏；在不断的矛盾斗争中地球上的自然条件万象更新，而且沿着一定方向变化。如一、二十亿年前的火山活动就比后来强烈，那时空气中的二氧化碳，海水中的硅化合物以及地面上的火山物质都比后来多。经过河流长期侵蚀和搬运，海水中盐分也在逐渐增长，河、海生物逐渐分化。自从三亿多年前植物由海中发展到陆地上以来，空气中的氧气增多了，而植物和氧气



的增长又为海生动物移居陆地准备了前提，并经过一系列演化阶段终于产生了人类。人类今天赖以生存的自然条件和不可缺少的各种资源不是一成不变的，都处在发展变化的过程中。人们认清了它形成的规律，就能能动地促使自然条件朝着有利于人类的方向发展，并按照客观规律改造自然和开发资源。这样，人们对地球的认识和改造的能力就大大提高了一步。

地球是重复着同一过程，还是在辩证地发展着？

二十世纪以来，人们对地球的认识和改造不断向广度和深度发展。一方面，地质调查已由一条条山脉扩展到整个大陆，而各大陆地质资料的积累使大陆之间的地质比较成为可能。另一方面，地球物理的研究使人们认识到，地球内部并非均一，而是分为地核、地幔和地壳，就象鸡蛋可分为蛋黄、蛋白和蛋壳一样；平均厚达几十公里的地壳也不是“铁板一块”，可分为下层和上层，而大洋壳和大陆壳的结构和厚度都不相同。对地球的这些新认识，使人们有可能进一步探讨地球的历史发展。这样，一个古老的问题重新被提了出来：地球是怎样发展的？

围绕着这个问题，两种世界观激烈地斗争着，斗争的焦点首先是：我们居住的大陆除了升降外，是否还曾发生过大规模的水平移动。

一九一二年，魏格纳根据大西洋两边大陆的地形、地质构造、古生物区系、古气候和矿产分布的比较，提出了大陆漂移科学假说。他用丰富的地质资料论证现有各大陆是由一个古陆分裂漂移形成的，而大洋也是不断更新的，大陆和大洋都不是固定的、永存的。虽然，自古以来人们就发现了地壳运动，如我国《诗经》上就有“百川沸腾，山冢岑崩，高岸为谷，深谷为陵”的说法，但是千百年来，人们习惯地认为地壳运动就是地壳原地升降。而大陆漂移说却大胆地提出在地球史中地壳可以一漂千里，这岂不是“异想地开”的“邪说”吗？因此，这个假说一经提出，就引起极大的轰动。

其实，魏格纳的假说是依据几个世纪社会实践中积累起来的材料得出的。早在十七世纪，继新大陆发现并弄清楚它的轮廓之后，欧洲人就惊异地发现，大西洋两边岸线形状如此吻合，以致若将欧非大陆和美洲大陆并在一起空隙甚少，从而产生了大陆漂移的思想萌芽。十八世纪，布丰根据大西洋两边生物区系的比较，也设想两边大陆过去曾经相连。十九世纪中叶，斯尼德尔根据陆生生物化石的



研究,明确指出,大西洋是在晚石炭世(约二亿七千万年前)后由大陆分裂漂移而形成的。十九、二十世纪之交,又有许多人先后指出,亚欧大陆曾自北向南整体运动过,致使其南缘的“古地中海”闭合隆起,形成从阿尔卑斯到喜马拉雅连绵万里的宏大山带。所有这些材料和看法对于许多地质学内行来说是熟知的,但是由于旧传统观念的束缚,他们宁愿牵强附会地设想在各大陆之间都有一架“陆桥”来引渡古代的陆生动植物,也不敢设想陆块之间曾发生过大规模水平移动。而魏格纳是一个青年气象工作者,对于地质学是外行,但正是这个外行作出了内行们所不敢想也不敢作的新论断,向传统的大陆固定论和大洋永存说提出了挑战。

由此可见,大陆漂移说的产生,决不是出于某个人的天才或灵感,而是人类对地球认识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当然,它也必然有时代的局限。这个假说的一个明显的缺陷就是设想大陆漂移是发生于地壳的上、下层之间,但这是与岩石粘度的计算相矛盾的。传统学派抓住这个缺陷,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把整个假说全盘否定,斥之为“毫无科学根据的幻想”。由于这个缺陷的克服有待生产和科学的发展,所以到了四十年代,主张大陆漂移的活动论思潮日趋沉寂,而主张大陆不动的固定论思潮又时兴起来了。二十世纪中叶,欧美和苏联的某些固定论者断言,原始大陆和原始大洋在地球上的位置都是固定的,并提出大陆扩大和大洋缩小就是地壳发展的“基本规律”。在他们看来,大陆、大洋及其各地质构造单元之间没有什么必然联系;而地壳的发展则永远重复着同一过程,即由活动性的大洋壳向稳定性(或僵化)的大陆壳转化。照此类推:全球大洋壳完全转化为大陆壳之日,就是地球僵死之时,那时,地壳运动也就消失了。事情果真是这样吗?

“自然界是检验辩证法的试金石”。(《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亚洲幅员广大,有着丰富的地质内容。随着地质调查的开展,亚洲新的地质发现,同固定论的旧观念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例如中国古陆就从来没有僵化过,而是以不断更新的形式活动着。二十年代以来,我国地质学家李四光运用力学的观点和方法,分析了世界的特别是东亚的地质资料,发现在亚洲和其他大陆上都存在着各种不同力学性质的地质构造型式,它们不是杂乱无章的,而是有着一定分布和组合规律。这些规律不仅清楚地反映出各个大陆地壳水平运动的普遍性,而且还反映出它们与地球整体运动的内在联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适应地球深部和海底



探矿以及地震预报的需要,地球物理学和海洋地质学取得了进展,一些重大发现给予地壳活动论以有力支持。这些发现告诉人们,无论大陆壳还是大洋壳都曾发生过大规模水平移动,而且连壳下地幔物质也在缓慢流动着。所谓“原始大洋”并不原始,因为一般洋底岩石年龄最老不超过早期中生代(约二亿二千万年前);太平洋底也并不“太平”,而是在不断地移动着,因此,任何一个大洋都不可能“永存”。

恩格斯说:“只要自然科学在思维着,它的发展形式就是假说。一个新的事实被观察到了,它使得过去用来说明和它同类的事实的方式不中用了。从这一瞬间起,就需要新的说明方式了——它最初仅仅以有限数量的事实和观察为基础。进一步的观察材料会使这些假说纯化,取消一些,修正一些,直到最后纯粹地构成定律。”(《自然辩证法》)根据半个世纪以来生产和科学实践中发现的新材料,人们对活动论作了新说明,提出了新假说。有一种假说设想,在地球史中,随着上地幔软流层的缓慢流动,大陆壳跟着一起漂移,而大洋壳则不断被卷入地幔之中,地幔物质经过对流,由大洋中脊或大陆裂谷以岩浆的形式溢出,使大洋底不断扩张和更新。以李四光为代表的一些中国地质工作者,则设想地球内部的物质运动必然引起地球自转变速,它不仅使地表水体扁率发生变化,从而推动两极与赤道之间的海水进退;并且会引起地壳中较柔性岩石发生经向和纬向缓慢流动,从而造成地表各种构造型式的规律分布。尽管各种活动论假说侧重的方面不同,而且存在着一些尚待研究的问题,但它们共同的见解都认为地球不是在僵化,而是以某种新形式活动着;地球的发展不只是数量增减和重复,而是有飞跃和剧变;地球发展的原因不在于地壳局部的偶然因素,而在于地球内部必然的矛盾斗争。人们有根据设想,在地球内部,各种物质运动形式也是在矛盾斗争中展开它们的历史。在斗争中,地球的各种物理场(力场、磁场、热场等)、地球的两极和赤道以及自转速率都在沿着一定方向变化着,就连一年有十二个月和三百六十五天也不是固定的,如在三亿多年前,每年就是十三个月和三百九十天左右。放射性同位素的发现和研究进展使我们有理由推断,地球各种元素也不是永存的,而是处于不断兴衰转化之中。因此,整个地球由里到外,由无机界到有机界,“归根到底是辩证地而不是形而上学地发生的;自然界不是循着一个永远一样的不断重复的圆圈运动,而是经历着实在的历史”。(《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

其实,固定论的基本哲学论点并不是什么新鲜货色,是违反辩证法的陈腐观



点，它们关于“发展原理、进化原理的说法，都是片面的、内容贫乏的，都是把自然界和社会的实际发展过程（往往伴有飞跃、剧变和革命）弄得残缺不全”。（列宁：《卡尔·马克思》）可以预见，随着生产和科学的发展，固定论所维护的形而上学偏见将不断遭到失败，而活动论所引出的辩证法论点将不断得到发展。固定论的衰落和活动论的兴起无疑是人类认识地球的又一个进步，它激发着人们打破传统观念，解放思想，去更大胆地找寻和开发地球深部和海底的无穷无尽宝藏，并在预防乃至利用或消除破坏性地震的斗争中采取革命性措施，以造福于人类。

地球的未来一定属于人民

“无产阶级认识世界的目的，只是为了改造世界，此外再无别的目的”。（《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人类能不能改造地球？是不是人定胜天？对于这个问题，历来存在两种对立的见解。历史上一切反动的腐朽的阶级都是叫人听天由命，例如，孔丘就鼓吹“畏天命”，却说他自己“知天命”；而叛徒、卖国贼林彪则自比“天马”，自吹“受于天”。在这些反动派看来，地球上的一切都遵循于“天命”，而“天命”的体现者就是所谓“天子”、“天才”、“天马”之类。总之，他们要人民群众做帝王将相的奴隶，同时也做地球的奴隶。但是，奴隶们从来不听他们这一套，公开申明“不畏于天”！人民群众和历史上的革新派无不坚信人定胜天。例如，法家代表荀子就明确指出：“制天命而用之”；柳宗元进一步指出：“受命不于天，于其人”，驳斥了儒家的天命论和“君权神授”说。这都是说人要制服自然界，使自然界为自己服务。

近年来，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的御用学者，在环境、粮食、资源等问题上大作悲调文章，叫嚷人类的“生态危机”、“粮食危机”到来了，“资源枯竭”了，在资本主义世界引起一片混乱和不安。但是，用马克思主义这个政治上的望远镜和显微镜去观察，这类悲观论调的欺骗性是不难揭穿的。

唯物辩证法认为：人与物的关系，包括人与环境的关系，决定的因素是人。人是环境的产物，但环境正是由人来改变的。人民群众改造环境的能动性发挥得怎样，首先取决于社会制度。在资本主义世界，生产资料掌握在垄断资产阶级手里，人民处于被奴役的地位。反动统治阶级破坏自然环境，放任三废毒害人民；把人民血汗换来的粮食据为己有，而不管人民死活；把人民辛勤挖掘出来的大量



资源制成炸弹、凝固汽油弹和核弹屠杀人民。这些事实说明，帝、修、反已完全堕落为害人虫，迟早要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从本质上说，不是“生态危机”和“粮食危机”到来了，而是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总危机加深了；不是“资源枯竭”了，而是资本主义“这个反革命制度已经枯竭了，它的社会力量已经枯竭了”。（列宁：《今日俄国和工人运动》）如果说，十九世纪初的灾变论反映了当时封建贵族的垂死绝望的话，那么，毫不奇怪，现行的悲观论调正是帝、修、反灭亡前夜的哀鸣！与此相反，“社会主义不仅从旧社会解放了劳动者和生产资料，也解放了旧社会所无法利用的广大的自然界”。（《多余劳动力找到了出路》一文的按语）解放了的中国人民，焕发出无限的创造力，向地球开战，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在辽阔的国土上，与天斗，与地斗，与阶级敌人斗，斗出了一个初步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全国人民意气风发，令高山低头，叫河水让路：什么世上的困难都可以克服，什么人间的奇迹都能够创造，立下愚公移山志，“敢教日月换新天”。我国古代人民关于移山填海的想象，正在成为现实。两种社会两重天。人民群众要有效地改造地球，首先要改造社会；要做地球的主人，首先要做社会的主人。“我们相信革命能改变一切”。（《唯心历史观的破产》）

“全世界共产主义者比资产阶级高明，他们懂得事物的生存和发展的规律，他们懂得辩证法，他们看得远些。”（《论人民民主专政》）地球诞生至少四十五亿多年了，迄今仍然充满活力，日新月异地向前发展。作为物质的一种具体存在形式，地球也有一个发生——发展——消亡的过程。它在一定条件下产生出来，也将在一定条件下否定自己，转化为更高级的存在形式。“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人类随着地球的发展，不断地改造自己，也将转化到更高级的阶段。今胜于昔，是历史的必然，而一切反动的统治阶级不欢迎这条真理。他们炮制了“不动论”、“不变论”和“固定论”，以寄托他们奢望“永存”的美梦。当革命宣判他们死刑的时候，就一再发出“地球末日”的嚎叫，以掩盖其必然灭亡的历史命运。但是，革命潮流势不可当，社会主义制度终究要代替资本主义制度。在社会主义历史时期中，人类自身及其活动的一切方面，包括自然科学在内，都将以前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突飞猛进，有如旭日东升，使以往的一切黯然失色。社会的未来属于人民。地球的未来也一定属于人民。

